

抗

破

點

寬

卑

和的

反

動



張

執

一

編

讀書生活出版社

特約經售

抗戰中的黨派和別派

張執一編

特約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抗戰中的黨派和別派

實價國幣五角

編者兼
發行人

張執一

特約經售

讀者生活出版社

電度武庫街一〇〇號
桂林桂西路陽家巷
成都祠堂街三十三號
貴陽中華路一四六號
昆明華山南路九十一號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三九年三月補正初版

抗戰中的政黨和派別

目 錄

中國國民黨·····	一
中國共產黨·····	二三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	五四
國家社會黨·····	六四
中國青年黨·····	八〇
全國救國聯合會·····	九九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一〇九
附錄：托洛斯基派·····	一一六

中國國民黨

一 歷史和組織系統

大家知道中國國民黨是現在掌握政權的政黨，是領導這次抗日戰爭的最大的一个政黨。他的創造者是孫中山先生；它是由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遞演而來的。它的特點，是它在一開始就以聯盟的姿態出現。這一點在研究國民黨史的發展的時侯，就充分的証明了。

興中會係成立於一八九四年，當時羅致的份子除少數留學生，知識份子以外，並聯合在下層民衆中有雄厚組織的會黨，以『講求富強之學振興中華』相號召。因爲在萌芽時代，那時只是算是一種小組織的活動，其工作也僅僅限於宣傳而已。到了一九〇五年，聯盟的形式更見具體化，因之革命的內容也隨着豐富起來。以興中會爲骨幹，聯合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恆爲首的光復會，黃興宋教仁等爲首的華興會，共同成立同盟會。他們當時的綱領是1. 驅逐鞑虜，2. 恢復中華，3. 建立民國，4. 平均地權。

辛亥起義，中華民國成立，大部份革命黨員開始妥協，以爲革命完全勝利。遂捨棄革命鬥爭而轉向政黨的議會鬥爭，因此，同盟會在一九一二年又進行改組了，定名爲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是吸收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勵進會，國民公黨共同組織成功的。可說是這時的國民黨是成爲一種代表各上層階層的政客的聯盟。那時的綱領是1.促進政治統一，2.發展地方自治，3.實行種族同化，4.注重民生政策，5.維持國際和平。當時的國民黨雖然在衆議院中佔了大多數的議席，可是因爲沒有革命的精神，敵不住袁世凱的進攻。袁世凱進攻國民黨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組織進步黨（包括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與國民黨對抗；一是實行收買政策來瓦解國民黨。這種內外夾攻的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國民黨遂分裂爲政友會相友會集益社超然社等小組。等到袁世凱的拘捕令一下，國民黨便解了體。

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爲着保存中國革命的力量，遂將國民黨的名義取消，重行組織中華革命黨。凡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份子，必須履行宣誓，打手印，填寫證書，奉孫中山先生爲該黨總理。主要份子有居正，胡漢民，張繼，張靜江，廖仲愷，汪精衛等，但是因爲當時國內各階層的革命情緒低落，反動勢力的高漲，致該黨組織力量相當薄弱。至一九一九年中華革命黨又實行改組，

更名為中國國民黨。以實現三民主義鞏固共和政體為綱領。

一九二二年蘇聯代表越飛來華，與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先生訂立「越飛孫文協定」。在這一協定的啓發之下，接受蘇聯革命的寶貴教訓，使中國國民黨完成為一個革命的政黨，造成一九二四年澈底的改組，宣佈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當時確定的鬥爭方針是1.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與地位；2.實現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為標準的階級選舉制度；3.促進人民出版，集會，結社，言論，信仰的自由；4.規定土地價格及稅收，私人土地所有權不能超過一定限度。土地所有者須按實報價，以備需要時之購買。規定勞働法，改良工人生活，改造農村組織，改善農民生活。男女平等。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的。大會發佈的政綱，其對外政策：則為1.一切不平等條約（如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國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皆當取消，重訂雙方互尊主權之條約。2.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3.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亦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4.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

失之範圍內，保證并償還之。5. 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僭竊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盤，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受償還之責任。6. 招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于債務而降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其對內政策：則為1. 關於中央及地方之限權，採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田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2. 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當抵觸，省長一方面為本省自治之監導，一方面受中央指揮，以處理國家行政事務。3. 確定縣為自治單位，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複決法律之權。土地之登入，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宜，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即應育幼養老濟貧救濟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實力不能發達興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地方均之。各縣對於國家之負擔，以登入百分之幾，為國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百分之十，不得超過于百分之五十。4. 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5. 確定人民有集會，結

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6. 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次轉爲民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士兵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7. 政府及工業界，當即設法安置游民土匪，使從事對於社會有益的工作。8. 嚴定田稅及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厘金等類，當一切廢絕之。9. 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均足。10. 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11.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工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12. 于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並促進女權之發展。13. 勵行教育普及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加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14.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于必要時得依此報價收買，並徵收之。15. 企業之有獨占的性質者，及爲私人之力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其施政方法：則爲（一）建設之程度分爲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二）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均隸于軍政之下，而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

而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三)凡一省完全勸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員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長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為一完全自治之縣。(四)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代表會得選舉省長，以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于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五)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政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憲法草案當本於政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及時採擇施行。(六)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及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憲法頒佈之後，中央統治權則為國民大會行使，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吏，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復決權。(七)憲法頒佈之日，即為憲政告成時期，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施行全國大選舉，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

從此國民黨便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改善工人農民生活爲它們行動的指南，實行聯俄聯共扶植農工的三大政策。從此國民黨遂成爲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的革命聯盟。這些階級都集中在國民黨『總理指導之下，努力奮鬥。總理更於此時制定建國大綱，完成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之演講。更於挺身北上之際，發佈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而殿以最後之遺囑。』

它們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孫中山先生死後召集的。他們除了『確信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實爲今日中國之唯一生路』，願『以總理之言爲軌範，以總理之行爲表率，無間生死』更進一步，斷定『民族主義，與國際革命主義，其內容實爲一致。』『斷定帝國主義之基礎，已被動搖，其崩潰之期，必不在遠。而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及民衆，聯合奮鬥，實足爲其致命之傷。中國之國民革命，自中國言之，爲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由世界言之，爲一大部分人類之自求解放。故中國之國民革命！實爲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中國人民從事於國民革命，決非孤軍轉戰，若蘇俄，若世界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若帝國主義本國內之被壓迫民衆，皆與中國之革命民衆，立於同一戰線者也。』他們同這些『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相約，願在『民

族革命成功之後，同進於大同。」

這是國民黨的黃金時代，是國民黨革命內容最豐富的時代。因這一革命的黃金時代，遂造成了全國蓬蓬勃勃的革命運動，民國十五年北伐的空前勝利。不幸這種神聖的聯合，被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挑撥離間，而解了體。不庸諱言的，這個民主革命的組織，這時被反動勢力乘隙而入，以致釀成國內十年來新的內戰，便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幸而這個內戰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賢明的領導下結束了，而容納各個主張抗日的黨派在國民黨領導之下，一致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共同向我們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最近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推選各黨各派以及各個代表民意的份子為參政員，共商國是。這個國民參政會雖不是完全由民衆推選出來，但在抗戰期間，國民黨能夠設立如此準民意機關，不能不說是國民黨實行民權政治的先聲！

它的組織是以中央黨部，省黨部，縣黨部，區黨部，區分部為骨幹；全國代表大會，全省代表大會，縣代表大會，區黨員大會或區代表大會，區分部黨員大會為權力機關；總裁——中央執行委員會，省特派員——設計委員，縣幹事——助幹，區幹事會，區分部幹事會為執行機關；並以區分部為基本組織，使黨的活動成為整個的活動；更便於訓練黨員，督促黨員，達到每個黨員

都整個地爲黨工作。並設監察委員以檢舉，彈劾，督促各組黨員違背黨章的不法行爲；並由中央委員中推選常務委員成立常務會以處理日常工作；並在常務委員之上設一總裁，得行黨章中關於總理的職權；並由中央委員中推選政治委員成立政治委員會，決議政治事件，以作黨與政府間的媒介。其中中央常務委員會有常務委員十五人：卽丁維汾，居正，于右任，戴傳賢，孔祥熙，孫科，閻錫山，馮玉祥，葉楚傖，鄒魯，陳果夫，何應欽，李文範，白崇禧，陳公博。

總裁則爲蔣委員長，副總裁則爲汪精衛先生。

組織部長則爲張厲生，副部長則爲谷正倫，吳開先。

宣傳部長則爲顧孟餘，副部長則爲周佛海，董顯光。

社會部長則爲陳立夫，副部長則爲張道藩，馬超俊。

海外部長則爲陳樹人，副部長則爲周啓剛，蕭吉珊。

秘書長則爲朱家驊，副秘書長則爲甘乃光。

這次臨時代表大會決定了取消預備黨員制，建立青年團以蔣總裁兼團長，預備羅致全國的青年鬥士。並由蔣總裁嚴厲申令全體黨員：『嗣後本黨以內，再不得有所謂派別小組組織，應一律取

消。」避免摩擦，而集中力量！

二 信奉的主義——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所以又叫着『中山主義』，『孫中山主義』，『孫文主義』。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個部門結合而成。扼要來說三民主義的內容是：

甲，民族主義。『什麼是民族主義呢？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消失的原因：

一、滿清時代的壓制——『征服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寶貝，完全消滅。所以滿州人從前用過了很好的手段，把民族思想完全消滅。』

二、民族思想的消失——『中國因為失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打破我們；否則一定不能打破我們。』

三、提倡世界主義過早——『中國在明朝未亡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

所以一遇到被人征服，民族思想就消滅了。」

怎樣才能恢復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下列的方法：

一、明瞭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消失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我們民族是受什麼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裏來的呢？是從列強來的。所受的禍害詳細地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

二、善用固有的團體——「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

三、恢復失去的民族精神：1. 固有的道德，2. 固有的智識，3. 固有的能力。

四、恢復民族精神以後：要1. 學歐美之所長，2. 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濟弱扶傾。

乙，民權主義。「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平等自由是包括于民權之內。」

『……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括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

『直接民權：關於民權方面的方法……第一個是選舉權……第二個是罷免權……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修改新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復決權……』……在政府一方面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政治才算是軌道。』

丙，民生主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這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還是在方法。』

『……中國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

中分出大貧與小貧……」……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人類求解決生存的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

(一)平均地權：『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就是平均地權……』

(二)節制資本：『……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并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三)發達國家資本：『我們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夠的。……因爲外國富中國貧……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中國糧食生產，已然是靠農民，所以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至于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後結果。』『……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國家是人民所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以上是孫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

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在各個不同的階段中發展的，是隨着時代的演進而演進的。可以這樣說：三民主義是在孫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的戰鬥生活中培養起來的，它是充滿了革命性；它是爲了革命的需要而建設起來的，它一定要針對着現實，配合着一定的革命的實際任務，是用來解決某一個實際問題爲目的的。假使我們不了解孫中山先生這種革命的精神，固執地抓住他早年的思想，或三民主義最初的涵義，那就是大錯特錯了。我們肯定地說：因爲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革命聯合戰線的標幟，它的包括的涵義是很廣泛的；甚至它內面包括有各種的政治上的見解。但是無論如何，它內面絕對找不出違反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因素。只有根據這一個尺度，才可能去測量誰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只有根據這一革命的精神，才能看得到三民主義的發展！才能看得到三民主義光輝的前途。

總結一句：『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于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下面就是孫中山先生晚年親訂的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這是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

言上摘錄的。

『民族主義——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之民族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已為國民運動所摧殘，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促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耽耽然欲起而分其餘潤。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日趨於憔悴。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衆；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畧。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的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衆，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帝國主義受民族主義運動之打擊，而有所削弱，則此多數之民

衆，即能因而發展其組織且從而鞏固之，以備繼續之鬥爭。此則國民黨能於事實上證明之者。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力。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後，滿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毀無餘，則國內諸民族宜可得和平之結合。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所要求者即在此。然不幸而中國之政府乃爲專制餘孽之軍閥所壟佔，中國的舊勢力，不免死灰復燃；於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杞隴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種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故今後國民黨，爲求民族主義之貫徹，當得國內諸民族之諒解，時時曉示其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共同利益。今國民黨在宣傳主義之時，正欲積集其勢力，自當隨國內革命勢力之伸張，而漸與諸民族爲有組織的聯絡，及講求種種具體的解決民族問題之方法矣。國民黨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民權主義——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於憲法，以孫先生所創之五權分立爲

原則，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已。凡此既以濟代議政治之窮，亦以矯選舉之弊。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所得而私也。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惟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籍使得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凡有賣國行為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個人或團體，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民生主義——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主要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公平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的基礎。於此猶有當為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尤甚。國民黨之

主張，則以爲農民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郊，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或爲高利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爲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卹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三 最近的主張抗戰建國綱領

中國國民黨領導全國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大業，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固有賴於本黨同志之努力，尤須全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負，因此本黨有請求全國人民捐棄成見，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統一行動之必要，特于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衆教育各綱領，議決公佈，使全國力量得以集中團結，而實現總動員之效能，其綱領如左：

(甲)總則 一、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爲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二、全國抗戰

力量，應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邁進。

(乙)外交 三、本獨立自主之之精神，聯合世界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四、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并充實其權威。五、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畧，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六、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七、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偽政治組織，及其對內對外之行爲。

(丙)軍事 八、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使全國官兵明瞭抗戰建國之意義，一致為國效命。九、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民衆武力，補充抗戰部隊，對於華僑回國效力疆場者，則按照其技能，施以特殊訓練，使之保衛祖國。十、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在各戰區司令長官指揮之下，與正式軍隊配合作戰，以充分發揮保衛鄉土捍衛外侮之效能，並在敵人後方發動普遍的游擊戰，以破壞及牽制敵人之兵力。十一、撫慰傷亡官兵，安置殘廢，並優待抗戰人員之家屬，以增高士氣，而為全國動員之鼓勵。

(丁)政治 十二、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

決定與推行。十三、實行以縣爲單位，改善並健全民衆之自衛組織，施以訓練，加強其能力，並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以鞏固抗戰中之政治的社會的基礎，並爲憲法實施之準備。十四、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使之簡單化合理化，並增高行政效率，以適合戰時需要。十五、整飭綱紀，責成各級官吏忠勇奮鬥，爲國犧牲，並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爲民衆倡導，其有不忠職守，詭譎抗戰者，以軍法處治。十六、嚴懲貪官污吏，沒收其財產。

(戊)經濟 十七、經濟建設，以軍事爲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獎勵國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十八、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調節糧食，並開墾荒地，疏通水利。十九、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並發展各地之手工業。二十、推行戰時稅制，澈底改革財務行政。二十一、統制銀行業務，從而調整工商業之活動。二十二、鞏固法幣，統制外匯，管理進出口貨，以安定金融。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統，舉辦水陸空聯運，增築鐵路公路，加開航線。二十四、嚴禁奸商壟斷居奇投機操縱，實施物品平價制度。

(己)民衆運動 二十五、發動全國民衆，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

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爲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而動員。二十六、在抗戰期間，于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二十七、救濟戰區難民及失業民衆，施以組織及訓練，以加強抗戰力量。二十八、加強民衆之國家意識，使能補助政府肅清反動，對於漢奸嚴行懲辦，並依法沒收其財產。

(庚)教育 二十九、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注重於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與擴充其設備。三十、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與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三十一、訓練青年，俾能服務于戰區及農村。三十二、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此外可參閱大會宣言)

四 領 袖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是黨的唯一領袖；但自孫總理逝世，黨的領導權遂分爲三：即蔣、汪、胡三氏鼎足而立。以致弄得黨內的派別鬥爭，此伏彼起，有時藉內戰的形式表現出來。一直到蔣汪合作胡漢民氏去世，蔣先生事實上遂成爲黨的唯一最高領袖，最近蔣委員長且推

奉爲全黨的總裁，得行黨章中關於規定總理的職權。這要歸因於蔣先生的作事肯負責任，能吃苦耐勞，寬大，信仰堅定的能力和精神所致。尤其在這抗日的神聖戰爭中間，表示出堅苦卓絕的精神，和鞏固統一，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堅定信念，已成爲舉國一致所擁戴的抗日領袖，爲舉國一致所公認的歷史上的民族英雄！

中國共產黨

一 十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二一年組織的，一九二二年加入共產國際。它的前身，是五四運動後一部份想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知識份子所組織的馬克斯主義研究小組。它的產生，是由於在「五四」運動後中國的資本主義相當發展，培養成功了相當數量的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後的蘇聯對中國革命的積極幫助。由於這兩種因素，遂使新興的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他在政治上的代表人。

它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二一年召集的，這次會議，除了討論該黨的組織以外，還討論到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不過那時未曾正式的決定。它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二二年在西湖舉行的。當時通過了指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宣言：認為中國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如果要完成這個神聖的任務，就必須依靠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同時主張建立全民族的聯合陣綫，以達到中國革命的目的。它

們認爲『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審察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我們無產階級相信在今日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革命迅速成功。』這種偉大的啓示，不獨有它歷史上的意義，而且在今天還有他現實的意義。下面是它們當時所通過的鬥爭綱領：

- (一) 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 (二)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
- (三) 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共和國。
- (四)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
- (五) 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 (六) 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

社，罷工絕對自由。

(七) 制定關於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

A. 改良工人待遇；(甲) 廢除包工制。(乙) 八小時工作制。(丙) 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

衛生設備。(丁) 工廠保險。(戊) 保護女工和童工。(己) 保護失業工人等……

B. 廢除苛捐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C. 廢除厘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稅所得稅。

D. 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E. 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F. 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

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發表之後一月餘，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具體的提出了聯合戰線的辦法：

『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的基礎上（註：即鬥爭綱領）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

國繼續戰爭，而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是中國目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戰爭」。

以一個自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與革命的民主派合作，是否有根據呢？他們認爲是有根據的。因爲列寧曾經這樣說過：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有時要暫時的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妥協或合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雖是這種無產階級運動尚在萌芽的形式』（列寧在共產國際二次大會的講演）。

國共兩黨的正式合作，是在共產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在他們第三次代表大會裏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不是沒有爭論的。

參加這個爭論的，一派是以陳獨秀爲代表，認爲中共的一切工作，應該經過國民黨，服從國民黨，一切工作應該集中到國民黨，爲了國民黨而工作。一派是以張國燾爲代表，『反對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中共四次大會對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決議案）

同時又主張產業工人不應加入國民黨，手工業者黨員才可以加入國民黨。在共產黨看來，前一種主張，是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實際上是要使共產黨歸併到國民黨，失掉共產黨的獨立性；後一種主張，是『左』的關門主義，是不了解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所起的作用。這兩種傾向，在他們看來，都是錯誤的，都是對於當時的國民革命採取了消極態度的表現，是放棄了爭取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在他們認為前一種傾向的發展，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代，陳獨秀所犯的機會主義的搖籃；後一種傾向的發展，就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代，張國燾之所以被共產黨開除黨籍的伏因。

由於國共兩黨第一次的合作，中國革命運動有着飛躍的發展，尤其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民衆運動如雨後春筍的興起，反帝的浪潮開始漫延到全國。這時，中共在全國人民的面前，提出了他們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主張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選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在北京之國會已成爲封建軍閥之傀儡，國民已否認其代表資格。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夠製定憲法，才能夠建立新政府統一中國，也只有他能夠。否認各方面有假託民意組織政府統治中國主權。由此

國民會議所產生之新政府，須以真正國民革命之勢力，掃蕩全國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外國勢力，然後才不愧為統一全國的人民政府……」

從此國民革命運動更如火如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發生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直至軍閥曹錕吳佩孚被擊敗。當時要求召集國民會議的呼聲又甚普遍全國。所以中共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又提出他們第四次對時局的主張。他們認為：

「挽救此迫在目前危機之方法，不是各省軍閥的和平會議，或國是會議，也不是幾頭元老的善後會議，乃是本黨去年在北京政變時所主張的及中國國民黨現在所號召的國民會議，只有國民會議，才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為它是由人民團體直接選出，能夠代表人民的意思與權能。」

「我們希望國民黨領袖們，努力號召全國人民的團體，促成國民會議，並須努力使他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更應極力反對軍閥們拿什麼各省軍民長官會議來代替此會，執行此會職權。此預備會之任務，不但是籌備國民會議，我們更應號召各階級的民衆及與各派帝國主義者尚無確定的關係之武力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為臨時國民政

府——號令全國的唯一政府』

中國共產黨更具體提出了這一臨時政府的綱領：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一重要是收回海關，改協定關稅制，為國定關稅制，因為這是全民族對外的經濟解放唯一的關鍵。

二·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罷工刑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罷工之無限制的自由權，因為這是人民對內的政治解放之唯一關鍵。

三·全國非戰時的常備軍，均以旅長為最高級的軍職，廢除巡閱使，督軍，督理，督辦，總司令，檢閱使，護軍使，鎮守使，軍長，師長等軍職，因為這是杜絕軍閥勢力集中陷國亂政之重要關鍵。

四·軍閥之禍，罪在最少數高級軍官，失業入伍的兵士們所受壓迫與困苦與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後旅團司令部，應採用委員制，軍餉公開，應改良現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須給以土地及農具，或其他種確實可靠之生活。

五·規定最高限度的租額，取消田賦正額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規，謀農產品和其他種生活必需

的工業品價格之均衡，促成職業的組織，這都是農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時工作制，年節星期及各紀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資之規定，廢除包工制，工廠衛生改良，工人補習教育之設施，工人死傷保險法之規定，限制童工之年齡及工作時間，女工在孕前後之優待，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之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設勞働平民之住屋。

八·沒收此次戰爭禍首的財產，賠償東北東南戰地人民之損失及救濟北方水災。

九·各城市鄉鎮之厘金牙稅及其他正雜捐稅，在國庫收入無多，而小本營商者則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廢止。

十·廢除鹽稅米稅，以裕民生計。

十一·增加海關進口稅，整理國有企業之收入，徵收遺產稅，徵收城市土地稅，此等大宗稅收不但足以補償廢止舊稅——厘金，牙稅，鹽稅，米稅，田賦附加稅及其他各種正雜捐稅——之損失，並可用為補助退伍兵士失業貧農及推廣教育之經濟。

十二，為保障智識階級之失業及青年失學計，國家預算中，不得將教育經費移作別用，並應

指定特種收入如收回庚子賠款等爲實行中小學免費，優待小學教員及推廣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婦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地位上，均應與男子享平等權利。

這些主張，當時反動的北洋政府不獨不接受，而且停開國民會議，召集反革命的善後會議，又加以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北上死去了，以致以段祺瑞爲首的反動勢力更形囂張。但也更引起民衆的憤懣，而掀動了『五卅』的怒潮。因爲共產黨在這『五卅』運動中表現了行動的英勇，他們的勢力也隨着這怒潮氾濫于全國。由于國共兩黨切實的合作，中國革命運動從此更日益發展，遂創造了驚人的北伐勝利，使各帝國主義在中華民族英勇鬥爭的前面發抖。但不幸革命軍達到長江流域一帶，國民黨實行清黨，致這種預期的成功遭致失敗。從此共產黨員均退出國民黨，領導一部份軍隊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進兵廣東，結果是失敗了。共產黨中央至此遂反對繼續聯合國民黨政策，實行以工農兵貧民蘇維埃口號，暴動謀奪取政權。

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召集第六次代表大會，總結了他們過去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指出了以後奮鬥的總方針。他們認爲大革命中的基本任務，一個都沒有解決，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他們號召全中國的勞動者們爲了蘇維埃的新中國而奮鬥。他們那時決定的政

- (一)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 (二) 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
- (三) 統一中國承認民族的自由權；
- (四) 推翻軍閥××政府；
- (五) 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
- (六) 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
- (七) 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
- (八) 改善士兵生活，發給士兵土地和工作；
- (九) 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 (十) 聯合世界無產級與蘇聯。

他們在這個總方針下奮鬥了九年。他們也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其一是大革命時代的陳獨秀犯的機會主義；其二是六次大會以後的立三路線，但這都被糾正過來了。尤其是立三路線在其領導

機關內佔到統治地位不到半年，很快地被四中全會克服下去。

他們在『一二八』上海抗戰以後，看到了某些軍官有直接參加抗戰的可能時，即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用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通電，願意在（一）停止進攻蘇維埃與紅軍；（二）保障民主權利；（三）武裝民衆，創立抗日義勇軍的條件下，同任何國民黨軍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可惜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於共產黨的這種提議，認爲是『陰謀詭計』，除了福建的十九路軍曾經一度同他們訂立停戰協定之外，沒有別的反應。

一直到共產黨的紅軍退出中央蘇區，舉行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達到抗日前進目的地，在民族危機更形危急的時候，發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公佈了『十二月決議』，號召全中國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職業結成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時才得到廣大的應響。尤其在西安事變時，共產黨行動上表示了極度的誠懇，救護蔣委員長出險，最後才得到內戰的終止，國共兩黨又走上重新合作的道路，而發動了空前的對日抗戰！

在抗戰進行了快有半年之久，他們爲了『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茲錄於下：

全國各界同胞們！

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我國軍民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先生領導之下，對暴敵已進行了五個半月的英勇抗戰，雖然由於日寇軍事技術的優越，由於我國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存在有不容否認的弱點，以致平津察綏太原滬甯相繼失守，遭受部份的領土損失和暫時的軍事失利；然而五個半月的英勇抗戰，表示出我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覺醒，造成了我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團結，顯示出我軍將士驚人的英勇犧牲精神，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防軍隊，提高了我民族抗敵致勝的信心，相當地打擊了日寇的兇釁，部份地消耗了日寇的力量，增加了日寇前進的困難，助長了日寇內部的矛盾，同時，增加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進步力量對我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因而也就奠定了我們今日繼續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宣言：蔣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國國民書所提出之『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之主旨，與本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正相符合。中共中央誠懇的號召國共兩黨同志和全國同胞，本此基本方針親密攜手共同奮鬥。

中共中央鄭重地向全國同胞宣言：我國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然而部份領土

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初期戰線上的部份軍事的成敗，均不能決定中日戰爭的最後命運，而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堅強團結和長期艱苦抗戰之毅力與信心，實為爭取最後勝利之保證。且目前最大難關，既不在於兵力不濟，武裝不足和財政困難，亦不在於日寇的前進深入，而在於日寇於暴力之外，又加緊『以華制華』的企圖，並在於漢奸，敵探，托匪等正在加緊挑撥離間以破壞我國民族力量團結的陰謀，尤其在於我國民族力量的團結還未達到應有的程度。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同胞宣佈：當今民族危機更加緊迫之時，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實為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團結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環節，則為鞏固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中共中央認為當前足以告慰於全國同胞的，就是在國共兩黨方面不但都有了更加精誠團結必要的認識，而且都有了更加親密合作的決心；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並肩攜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在目前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號召國共兩黨同志和全國同胞，為保障繼續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共同努力，實現下列主要工作：

(一) 動員全中國的武力，人力，智力，財力，物力繼續守土衛國的長期抗戰——這首先要

堅持華北和東南的持久抗戰，鞏固江防，保衛武漢，發展敵人佔領地區的龐大游擊戰爭，援助東北及各地的義勇軍，來擊破敵人的前進，阻止敵人的深入，以便爭取時機，加強力量，準備進行決定的戰鬥。

(二) 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在政治上，組織上，武裝上，加強現有軍隊，建立新部隊，有組織的進行征募兵役運動，使我國在持久抗戰中，有統一指揮，統一起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三) 充實和加強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團體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刷新各省吏治，肅清貪污腐化份子，使政府一切機構和施政方針，能適應抗戰勝利的需要。

(四) 實行國防經濟政策——首先須努力建立軍事工業，加速軍事交通和實行戰時財政政策。

(五) 建立鞏固後方，動員和組織廣大民衆協助軍隊和政府積極抗戰——一方面堅決肅清漢奸，敵探，及日寇走狗的托洛斯基匪徒份子，另一方面廣大地動員組織和武裝政府統治區域和被敵佔領區域的民衆使之積極參加各種有利於戰勝日寇的工作，同時加緊動員千百萬的國外僑胞盡力

於保衛祖國的各種事業。

(六)擴大國際宣傳和增加國際援助。

中共中央堅決相信：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力量定能在最近期間內，共同完成這幾項迫切的基本工作，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大中華民族，在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民共和國家的同情援助之下，定能在持久抗戰中，最後戰勝內受人民仇恨，外遭列強嫉視的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二 組織和活動

他們的組織，最高領導機關，大致上與國民黨一樣，不過他們最高領導機關是「書記處」，下設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婦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派代表團駐共產國際所在地莫斯科，以取得國際上的聯絡；設政治局決議和執行政治事件。有省委、縣委、區委、支部各級領導機關，以支部為基本組織。過去的活動，在政權方面有蘇維埃政府；在軍事方面，有

中國工農紅軍；在文化活動方面，有左翼文化總同盟，下分社會科學家聯盟，社會科學研究會，左翼作家聯盟，新聞記者聯盟，電影劇者聯盟，教育者聯盟……等。在青年方面，有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些團體裏面都有他們的黨團組織，加強黨的領導。現在因為參加民族統一戰綫，這些獨立的活動都取消了。不過他們擁有願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以及將來的幸福而奮鬥的數十萬黨員，有廣大羣衆的政治影響。又因他們肯吃苦，肯負責，不怕犧牲，和耐心的學習，所以一切有羣衆的地方，都有他們的蹤跡。同時他們又肯和羣衆打成一片，衝鋒在前，退却在後，所以凡與他們接觸的羣衆，無不受他們的感動，而衷心愛戴他們！他們準備在最近期內召集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和規定如何在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總方針下，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取得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同時對於他們六次大會以來的鬥爭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

二 信奉的主義——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在馬克斯以前都是空想的，到了馬克斯的手裏才把它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出來。所以

共產主義又稱為馬克斯主義。

什麼是馬克斯主義呢？它的來源與組成部份究竟是那一些？據馬克斯學說的繼承者列寧告訴我們，說馬克斯主義有三個來源和組織部份：

「一、馬克斯主義哲學，即是唯物論。在近代一切歐洲歷史時期中，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葉的法蘭西，爆發過了反對一切中世紀教會，反對農奴制度統治與封建觀念的激烈戰鬥。唯物論是唯一的徹底的哲學和一切最正確的自然科學學說的承繼者，敵視若一切宗教信仰與舊的信仰等等。因此之故，所以民主派的仇敵們企圖用盡一切努力「推翻」，搗毀，誣蔑唯物論，而且擁護一切常時是贊助宗教辯護的各種形式的觀念論哲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堅決的主張唯物論哲學，而且歷史的指明過在這一基礎上的一切重大的錯誤傾向。他們兩人的這樣的觀點，在恩格斯的著作「費爾巴哈論」和「反杜林」中，同樣在「共產黨宣言」這一本為任何一個自覺的工人所必置的書中，有着極其明確和詳細的敘述。

「但馬克斯並沒有停留在十八世紀的唯物論上面，而把哲學推向前進。他把德國古典哲學的發現，特別是把黑格爾哲學的體系所引導出來的費爾巴哈唯物論豐富起來了。這些發現中最重要

的，就是辯證法，這即是最完整而深刻的與不僅是抓着事物的一片面的發展學說，關於物質的永恆的發展反映於我們人類認識上的相對性學說。最新的自然科學發現：鐳、電子、原子的變換，完全否認了一切資產階級的哲學和他們的「重新」倒退到陳腐的觀念論的一切學說，明白證實了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正確。

「馬克思深刻的發展了唯物論哲學，把牠徹底引用和推廣起來，從自然的認識一直到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顯示了科學思想的最偉大的收穫。在此時期以前，關於歷史和政治方面完全被渾沌和光怪陸離的觀點所統治着，從此，方能用完整和謹嚴的科學理論以代之。指明出由於生產力發達的結果，一個社會生活的階層才發展到另一個更高的階層，例如從封建農奴制長成出資本主義。

「人的意識是反映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而生存着的自然界即物質的發展；同樣，人的社會意識（即是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各種觀點與學說）也正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反映。政治的機構，是經濟的上層建築，例如我們看見現代的歐洲國家的各種政治形式，都是爲了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統治底鞏固。

「馬克思哲學是完備的唯物論哲學，他給了人類特別是工人階級以偉大的認識的武器。

「二、馬克思認為，經濟制度是建立起政治上層建築的基礎，因此更加注意研究經濟制度。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專門研究現代的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

「在馬克思以前，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在一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英國）已經建立起來，亞丹斯密士和達維德，李嘉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原理。馬克思繼續着他們兩個人的事業。他嚴整地奠定了和正確發展了這一理論。他指明了一切商品的價值是決定於在進行商品生產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數量。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在這裏只看見物與物的關係（商品與商品的交換），馬克思則揭發出人與人間的關係。商品的交換表現在個別生產者間，經過市場方法的聯繫，貨幣使得這一聯繫更加密切把一切經濟生活中的個別生產者不可分離的聯結成爲一個整體。資本使得這一聯繫更加發展，人的勞動力成爲商品。僱傭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土地，工廠，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工人的一部分工作時間用來補償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消耗（工資）；工人另一部分工作時間的勞動成爲資本家創出剩餘價值、利潤的泉源、資本家階級的財富泉源。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奠基石。

「工人勞動所造成的資本同時又在壓迫着工人，破壞小的經濟和造成失業軍，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增長着，機器的使用正在發達，農民經營墮入貨幣資本的網中，在技術落後的壓迫之下沒落和破產。在農業中，小生產的崩潰取着不同的形式，但牠的崩潰是無可置辯的事業。

「資本打坍了小生產，走向增加勞動的生產性和走向創造大資本家聯合的獨佔局面，生產本身成爲更加社會化——幾十萬幾百萬的工人聯結在一個有規律的經濟機體之內——而一般的勞動生產品則歸少數幾個資本家所佔有，於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增長起來，危機瘋狂的追逐市場，人民羣衆生存的無保障的事實發展起來。

「隨着工人對資本依賴的增長，資本主義制度創造成勞動團結的龐大力量。

「馬克思從商品經濟萌芽，從簡單的交換研究起一直跟着研究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直到大生產。

「一切新的舊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逐年的明白表現工人數目愈來愈多的增加，指示出馬克思學說的正確性。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了，但是這一勝利只是走到了勞動對資本勝利的門前。

「三、當着封建農奴制被推翻了的時候，在世間上出現「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很快就顯示於這樣的自由，即是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的新統系。反映對於這一壓迫的反對和抗議，立即就發生出各樣社會主義學說。不過原始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牠們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審判和咒罵資本主義社會，夢想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幻想良好的制度，想以剝削的不道德來說服富有者。

「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不能指示出實際的出路，牠不懂得闡明在資本主義中僱傭奴役制的本質，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法則，也找不出能夠成爲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

「然而，同時隨着封建制度，農奴制度的崩潰，在全歐洲，特別是在法蘭西起來的革命風暴，完全明白的顯示了階級鬥爭是一切發展的基礎和動力。

「沒有拚命的抵抗，任何一個對於農奴制度統治階級的政治自由的勝利都是不能獲得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間沒有拚死活的鬥爭，在任何一國資本主義國家決不能建立或多或少的自由與民主的根基。

「人們在沒有學會從任何一個道德、宗教、政治、社會的言詞，意見與語言中尋求出各種階級利益的表現的時候，他們常常總是成爲不可救藥的政治的欺騙和自欺的犧牲品。

「贊成改良的人們，當着還不懂得一切舊的制度不管如何野蠻和腐敗，總是受着統治階級的勢力支持的時候，他們常時是成爲舊勢力的朦朧的擁護者。爲要摧毀這些階級的抵抗，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尋找教育和組織鬥爭的力量，他能够——而且就是他們的社會狀況應當是能够的——組成力量，足以代替舊的勢力而創造新的社會的力量。

「只有馬克思的唯物論哲學，指示了無產階級從精神奴役這一爲一切被壓迫階級所遭受的苦悶中解脫出來的出路；只有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才能說明在一般資本主義制度中無產階級的現實狀況。」

「什麼是共產主義？它的根本的特點是什麼呢？——雅洛曼綏夫這樣告訴我們——

「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在那裏沒有階級區別的社會。是以一切人民爲統一勞動社會會員，來代替相互爭鬥着的階級。一切的力量和財富從前是消費於階級的相互堅決的鬥爭之上的，而現在是要運用於生產的勞動上，和自然的鬥爭上，人類生存的改善和人類能力的提高了。」

「共產主義消滅了對於生產工具的私有。一切工廠，作坊，運輸和土地等轉變為社會所有。以按照統一的嚴格的計劃進行有組織的工作的經濟來代替適應市場和競爭的規律的無組織的與盲目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了。」

「由於無組織經濟的消滅，同時也除去了經濟恐慌和帶有破壞一切的戰爭。」

「資本主義是顛動地跳躍地發展着的；興盛時期之後必有猛烈的經濟恐慌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經濟將有計劃地迅速和沒有病態地發展着。」

「生產力毫無障礙地向前發展。馬克思說：『一切社會的財富的來源將如廣大的河水般注流。』共產主義的社會不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阻止生產力發展的那些障礙物之一——如像對於生產工具的私有，羣衆的貧困和愚昧，巨大的不生長的浪費。」

「私有財產的取消和階級的消滅，消除了人對人的剝削的關係。造成大多數人飢餓生活，造成了極少數人財富的勞動變為自由人的生活是必需了。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及被奴役階級的貧窮也消滅了。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間的矛盾也消滅了。」

「同時階級統治的一切機關，——首先是國家的政權，也消滅了。」

「同時一切強制的形式也消除了。軍隊和監獄等也都消滅了。有益於社會的工作變成了人類的習慣和需要了。」

「在資本主義之下必不可免地存在着城市和經濟與技術落後的農村之間的矛盾，而在共產主義之下，這種對立的矛盾是要消滅的。」

「將要發生科學和技術及實際工作的最後的統一和溶合。科學本身將大踏步的向前發展。」

「生產力量的發展造成了一切人類的幸福，同時又整備好了為發展最高的文化之花的條件。」

「將要來到最有創造性的，從來未有過的科學的發明和光榮的藝術的獲得的時期。」

「新的共產主義的文化將永遠消除所有的一切宗教，迷信和舊生活的殘餘。」

「全世界的人類將轉變成爲統一的勞動的社會。爲了這個最終的目的——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無產階級現在是負擔着最大的犧牲和進行着英勇的鬥爭。」

四 最近的主張——爲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和抗日救國的

十大綱領而奮鬥

據他們宣稱，所謂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指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因為這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是孫中山先生創造的三民主義最高的發展。關於這，已經在國民黨一節裏介紹過。現在僅就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討論一下。據他們自己的解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能相容的，因為他們所信仰的共產主義，並不要在今日的中國內實行的。在他們認定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國家，中國目前所要求的只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恰恰三民主義就是爲了實現這個目的的主義，所以他們敢公開宣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他們爲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是不是拋棄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呢？他們沒有！他們「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最高的理想。」他們「堅決地相信共產主義是將來全世界必須走向的道路。」他們之所以宣佈停止階級鬥爭，他們的理由是因為在現階段的中國，階級的利益已經與民族的利益趨向一致。

下面就是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爲動員一切力量爲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對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否認日本外債，廢除日本條約，收回日本租界。

爲保衛華北與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爲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妥協。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

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實行全國抗戰。

反對單純防禦的消極作戰方針，採取獨立自主的積極作戰方針。

建立經常的國防會議，討論與決定國防計劃與作戰方針。

武裝人民，發展抗日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軍作戰。

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使指揮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發揚軍隊的積極性。

援助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義勇軍，破壞敵人的後方。

實現一切抗戰軍隊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國各地軍區，動員全民族參戰，以便從僱傭兵役制轉為義務兵役制。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全國人民除漢奸，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

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

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開放黨禁。

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餘出餘，有知識出知識。

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機概：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的革命分子，驅逐親日分子。

國防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

實行地方自治，剷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範圍內，與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

擁護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

聯合朝鮮台灣及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戰時農產品的自給。提倡國貨，改良土產，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反對投機操縱。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農民職員教員及抗日軍人的待遇。

優待抗日軍人的家屬。

廢除苛捐什稅。

減租減息。

救濟失業。

調節糧食。

賑濟災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

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
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在國共兩黨澈底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五 領袖人物

他們的領袖人物都是從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來自羣衆中，而又能與羣衆打成一片，指導羣衆。可說生活是平民化，頭腦是科學化，紀律是軍人化。這樣的領袖在中央當中，的確可找出很多。現在他們已經公佈的有：

- (1) 毛澤東 (2) 陳紹禹 (3) 朱德 (4) 周恩來 (5) 項英 (6) 張聞天 (7) 秦邦憲
- (8) 趙容 (9) 廖陳雲 (10) 王稼祥 (11) 彭德懷 (12) 任弼時 (13) 鄧發 (14) 劉少奇

(15) 何克全(16) 林祖涵(17) 吳玉章(18) 董必武(19) 徐特立(20) 曾山(21) 張鼎丞
(22) 陳毅(23) 楊靖宇(24) 商 崗

其中尤以毛澤東、陳紹禹(即王明)(出席共產國際的中國首席代表)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最爲國人所推崇。此外尙有勇敢善戰的林彪、劉伯承、賀龍諸將軍；善於著作與宣傳的凱豐，吳黎平，成仿吾諸先生，亦爲中國不可多得的人材。這不過是他們著名的一部份領袖；其實他們還有更多埋頭苦幹腳踏實地的民衆領袖，正在爲他們的主義，組織，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與幸福的將來而奮鬥！

他們雖然在鬥爭中養成了這些堅苦卓絕的領袖人物，但是他們仍然相信「民族和國家的命運，現在不僅僅是由領袖決定的，而首先和主要地是由千百萬人民來決定的」(斯大林)。他們的幾個主要領袖，如毛澤東、陳紹禹、秦博古、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等，現在均經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遴選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二黨)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是世人所稱的第三黨。該組織的開始產生是在十六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一部份左派人物，如鄧演達等，因不滿於國民黨的拋棄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大政策，以及共產黨中因執行機會主義路線被開除黨籍的份子如譚平山等，合流攜來的。

他們當初的活動的份子，是鄧演達、譚平山、黃琪翔、彭澤湘……奉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為領袖，但孫夫人從來未參加該組織實際活動。鄧演達未死之前，實際上的領袖即為鄧。鄧為人有毅力、有幹才、善宣傳；因曾做過黃埔軍校及大革命時代總政治部主任，在青年軍人中，有極良好的印象。自鄧不幸遇難後，全國人士，不管是同情或反對他的，都一致認為可惜。

「第三黨」這個稱呼，是吳稚暉贈送的，可是這個混號掩蓋了他真實的名稱。這一則是因環境關係，該組織的行動未見若何明朗化；再則是他們的名稱果有更改，外人捉摸不定。他們有時名中國國民黨行動委員會，中華革命黨，有時又名新黨，中國工農新黨，農工黨，在福建政變建

立人民政府時期，又同陳銘樞等所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合組過生產黨，一直到不久以前，才定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

施存統在脫離改組派以後，曾經一度參加該組織，後來無形的退了出來。現在的活動人物，僅剩有譚平山，章伯鈞，彭澤民，彭澤湘，楊清源，麥朝樞等。共產黨在廿四年發表一宣言，要求各黨各派合作抗日，第三黨曾響應這個號召；自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國內形勢已轉入一個新階段，各黨各派在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旗幟下，莫不拋棄前嫌，重新聯合，一致對外；第三黨亦決定一致參加抗日，共赴國難。

他們在過去「組織「反日陣綫」提議」的第一次宣言中，曾經堅定的說：「中國反帝民族革命戰爭，應自對日宣戰始……日本帝國主義者將不惜以任何手段，在最短期內奪取華北和西北的決心，亦可以斷定；倘中國不變為朝鮮第二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吞併行動，決不終止」；「因此，中國的人民，目前除了以民族革命戰爭，回答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併中國的暴行，足以保障華北和西北，收復失地；解放中華民族而外，其他一切方法，都是自殺的方法」。

所以他們在那時主張「召集人民非常代表大會，由一切真正民衆組織和革命的政治團體及革

命軍人選派代表參加」。成立最高抗戰機關，主持對日作戰事宜。

並且他們認為「一切革命的黨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後的關頭中，應該放棄其宗派的偏見，在反帝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兩大原則之下，形成鞏固的聯合戰綫，組織統一的行動指導機關」。

在第一次宣言發表了以後，他們「所看到的各政治機關團體和許多革命份子發表的意見，雖若干問題」，與他們的「主張，仍有原則上的不同，但對發動反日戰爭一點，則莫不相同。可見發動反日戰爭，實為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實為一切不願當漢奸作亡國奴的人民的迫切需要，實為今日中國的「國是」。

他們「認為國內各黨派對於若干問題意見的分歧，既是原則上的，便是中國國內矛盾的反映；國內矛盾一日未除，則各黨派對某種問題意見的分歧，勢必一日存在，這種矛盾分歧，斷非個人主觀所能強制消滅的。但是這種矛盾和分歧的存在，並不是真正的妨礙反日戰爭的發生，只有輕視反日的這一共同點，才是反日戰爭發生的障礙」。

他們「認為已成為「國是」的反日戰爭」，那時「尚不能爆發的癥結，實在於全國一切力量

的不能集中；而全國一切力量不能集中的主因，又在於全國各黨派之重其相異輕其相同。倘若承認民族革命的反日戰爭，是挽救中華民族滅亡的保障，則便不能不承認全國一切力量的不能集中，乃是目前救亡工作中的一重大危機」。

他們發表組織「反日陣線」提議第二次宣言的時候，正是「日本少壯派的軍人，求貫徹其黠武政策，不恤以叛亂的形式，屠殺其國內主張緩進的重臣元老」的時候，他們雖不知「將來的變化，是否以全如少壯派軍人之所願，固尚難判斷，但對於中國的吞併，將來任何形態的內閣，勢必實現少壯軍人的急進政策，厥可預言。中華民族滅亡的慘禍，將因日本此次政變而愈烈；其為期也，亦必愈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這一點，是他們「要為全國不願當漢奸作亡國奴的各個黨派再三垂涕而道的」。

他們「認為國內任何矛盾，都大不過日本帝國主義者與中國的矛盾；各黨派間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認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他們「認為集中全國一切力量，發動反日戰爭，不僅是絕對的必要，而且有完全的可能。西班牙法蘭西反法西斯危險的民衆陣綫，尚可以構成；構成後並可以通力合作，達到勝利的領域；難道中國求民族生存的反日陣綫，獨不可以形成？若謂舉國絕大多

數的人士，甘心亡國，不願救亡，古今中外，甯有是理？」

所以他們當時「謹以最大的熱忱，正式的向全國各社團提議：以最快的速度，組成全國的「反日陣綫」。他們的要求：「除漢奸外，凡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願意以最大犧牲與日帝國主義者拚命來爭取中華民族生存的」，對於他們「這一緊急提議，予以嚴重的考慮和明白的答覆」

「至於怎樣形成「反日陣綫」的問題」，他們那時的意見，認為：

「第一，各黨派應該公開承認：現時中國一切的黨派中，沒有任何一個黨派，具有單獨負荷反日使命的力量。因此，「反日陣綫」只能由各黨派各社團共同集結而成，決非某一黨派所能包辦。「反日陣綫」是當前時代所要求的一個超黨派的組織，其任務專在集結全國一切的力量，發動反日戰爭；凡願在「反日陣綫」上努力各黨派各社團以及各個革命者均可參加，對於反日以外之一切政治主張，均容其各自保留，而不加干涉。只有這樣，方能消除「反日陣綫」形成的基本障礙。否則彼此互爭的結果，必然發生議論未定，兵已渡河的悲劇。因為各黨派的分歧，乃是社會客觀環境的產品，決非短時間內所能強制消滅的；惟有重其相同輕其相異，方是非常時期的正

當解決方法。這是「反日陣綫」形成的前提。

「第二，「反日陣綫」的構成，已經不是宣傳的時期，而應該是實現的時期了，因此各黨派各社團應該迅速的推定負責人員相互交換意見，有三個以上的帶地方性的團體代表會談時，即可成立當地的臨時圓桌會議，籌創當地的「反日陣綫」；有三個以上的具全國性的全體代表或三個地方的「反日陣綫」代表會談時，即可成立全國臨時圓桌會議，籌創全國的「反日陣綫」。

「第三，臨時圓桌會議，除籌創「反日陣綫」而外，同時就可能範圍內，商討實際的反日工作，分途負擔，以期商討得有實效，不落空談，更不至互相觀望，坐失事機」。

在抗戰以後，他們的中央負責人且前來漢口四川等地，共謀增強抗日力量，此點尤足證明其已下精誠合作的決心；並發表抗戰八大政治主張，為適應現階段對集中力量起見，對於「土地革命」的口號，已擱置不提了。茲介紹「抗戰八大政治主張」於後：

「（一）提前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製定全國上下一致遵守之政治綱領，俾全國各階層力量，能迅速集中，各方政治意見，能澈底融洽，以樹立政府之堅實抗戰基礎。

（二）實現最低限度之民主政治，以增強人民對政府之信賴，並使人民得以自由發揮其抗戰

能力。

(三) 建立特殊機關，統一各黨派所領導之民衆活動，俾全國宣傳組織與訓練，完全趨於一致。

(四) 成立武裝民衆指導之機關，指揮全國義勇軍之活動，使其與正式軍隊之動作，有適當配合，藉收指臂之效果。

(五) 於全國各地成立在鄉抗日志願軍，以備徵兵制未完成前之調用。

(六) 成立戰時經濟計劃機關，計劃戰時必須之生產與分配，並分設於各省市，以促成戰時計劃經濟之實現。

(七) 對廣大戰區中之勞苦人民，自由職業者，中小工商業者，失業公務人員等須有妥善之救濟方法。

(八) 除漢奸外，宜從速開釋全國政治犯；並取消以前有碍民衆運動之各項特殊條例。他們認爲「抗戰的失敗就是政治的失敗」。「如何克服失敗的因素，真正達到全國總動員的

目的呢？目前有兩個根本的政治問題，必須急於解決」：

「第一，各黨派聯合的問題」。他們認為各黨派聯合的基本原則：「首先，是統一聯合戰線的形成，並不是各黨派的消滅或解體；各黨派組織力量的增強增大，不應當是政府統一領導的力量的分散或削弱」。其次，民族聯合戰線應當是所有贊成抗敵救亡的黨派實質上一致的聯合，不是某黨與某黨的形式上的合作。一切在野的黨派在法律地位上應當完全平等。一切黨派在平等的地位上與當權的政黨取得政治上的聯盟才算是完整的聯合戰線」。

「第二，建立民主政治的問題」。他們認為爭取最後勝利，必須動員民衆，尤其是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之農民衆」。但這必須「實施民主政治，開放民衆運動」。他們要求「（一）人民有自動的組織武裝訓練言論的自由；（二）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一經通過最高的民意機關，成爲一種政策，交與政府，政府應順從民意忠實地執行。同時在另一方面，人民應服從政府的領導，使政府的權力加強，一切行政得以推行無阻」。並且「要主張政府召集『全民救國代表大會』」。這個大會應當是國家臨時最高的權力機關，有全權來決定以下這些緊急問題的方案：

- （一）整頓國防軍；
- （二）執行革命外交；
- （三）實行戰時統制經濟；
- （四）募集救國公債；
- （五）救護傷兵，慰勞將士；
- （六）安插流亡難民；
- （七）組織民衆武裝民衆；
- （八）改善工人農

民一般貧民的生活；(九)勵行救國教育；(十)肅清漢奸；(十一)剷除貪官污吏；(十二)改革行政機構；(十三)給人民言論集會結社武裝的自由。

「這些重要方案決定以後，由大會交與政府執行並督促其忠實執行」。

他們的領袖彭澤民先生等致國民黨中央意見書亦曾說過：「以弱抗強，其勝利條件非決於一時之勝負，而決於持久的抗戰，求能持久抗戰固須政府下大決心，尤貴乎政府能運動全國民眾之力量；唯能使全國人民由散漫而進於組織，由被動而進於自覺犧牲，方能操最後勝利之左券」。

他們主張怎樣動員農民呢？他們認為「最低限度亦必須作到下列幾點：

- (一) 立即頒布保障農民集會結社言論之絕對自由權。
- (二) 幫助農民自動的成立生產消費合作的組織，及推廣農村愛國的教育。
- (三) 改革保甲制度，建立真實代表農民的鄉村政權，在武裝保衛家鄉的口號下，廣汎的發展農民的自衛武裝。
- (四) 蠲免一切苛捐雜稅，嚴禁額外盤剝，以及軍需品之直接徵發。
- (五) 實行二五減租，并規定最高租額。

(六) 嚴禁高利貸，并實行低利貸款給農民。

(七) 興辦水利，實行墾荒，改良技術來發展農業生產，并設法救濟安插失業與被難農民，參加生產事業。

(八) 適當的分配與解決農民耕地問題，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在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以後，其主要負責人如譚平山，徐謙等都已恢復國民黨黨籍。章伯鈞，譚平山等並担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們出版有「抗戰行動」一種，由麥朝樞主編。

國家社會黨

提到「國社黨」這幾個字，大家就會聯想到希特勒在德國的「德政」：屠殺，禁錮，飢饉，要求侵略殖民地戰爭的瘋狂化。可是「納粹」這個字，應當譯為「民社」，而不是「國社」。中國的國社黨，據他們負責人的解釋，是不同於希特勒的「納粹」，而是信奉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黨，即是絕對的愛國主義漸進的社會主義，修正的民主政治。

據他們最高領袖張君勱氏的結論，所謂「絕對的愛國主義」其內容有五點：「（一）人民之所以愛國，不是為自國家手中得到好處或利益；（二）即在國破家亡中，不特無好處可得，反而有害處可受，而愛國之心應仍舊絲毫不減；（三）不因強者戰勝之故，輕易受人威脅而背其祖國；（四）在國破家亡後之愛國心，即為民族復興之根據；（五）所以愛國，不是為求國家之報酬，乃是行其心之所安。」

漸近的社會主義，當然是主張就現有的制度加以改良，而反對暴力革命。

據他們的又一領袖諸青來先生的意見，一切問題只有在「自由主義」之下方可解決。比如抵抗外來的侵略，也是要求自由；主張民治，也是要求自由；要求麵包也只有自由主義之下方可得到公允的辦法。照這樣看來，又可說是「絕對的自由主義」了。

現在讓我們把他們全部的理論扼要地介紹出來——

第一、「國家民族本位」，他們政綱中曾有語云：

「吾們相信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階級觀念決不能與之相抗，無論是已往的歷史亦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達到高度，無不立刻沖破了階級的界限；日本人壓迫吾們到這種地步，雖平日在對抗中的資本家與勞工亦都不由得不聯合一氣，從事於抗抵，所以民族觀念，是深中於人心，而較階級為強。」

「只有民族的縱斷，能沖破階級的橫斷，却未有階級的橫斷，能推翻民族的聯合；即以蘇俄論，他的成功處，不在階級鬥爭的國際化，只在社會主義的民族化」。

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他們政綱中曾有語云：

「吾們所想出的修正的提案是什麼？首先可說的便是必須建立一種政治制度，在原則上完全

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實施必須使黨派的操縱作用不能有所憑藉，於是這種政制在平時不拘兩黨或多黨都能運用，即假定無黨亦可運用，而在緊急時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與力量，不分黨派，我們相信這樣制度不是不能創造的。

「但歐戰之後，批評民主政治者，往往而見如今之意德等國竟目民主政治為惡劣政治；同人等以為政治的社會要素，不外乎二，其屬於國家者為權力，其屬於個人者為自由。為行政之敏捷，與夫應急之處置計，不能不抬高權力；為個人之自發自動與養成自己負責心計，不能不許以言論結社之自由，地方自治與夫參政大權。惟有此等權利，而後人民有實際上參預政治之機會，而後知輿論界議場上政府中言論之不可苟發而高調與笑罵之無濟於事。蓋民主政治之下，人民得真正參加政策之決定，其責任心自養成，其政治智識自增進，及至國難臨頭，尤貴乎事權之統一與執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權力託之戰時政府，可見正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實行，及至戰時人民自然感覺權力集中之必要；如歐戰時之各民主國之戰時內閣，皆其彰明較著者也。」

第三、「社會主義」，關於經濟制度，他們期望社會主義之實現，政綱中曾有語云：

「一、為個人謀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況計，確認私有財產。」

「二、爲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濟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

「三、不論私有與公有全國經濟，須在制定之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担任而貫徹之。

「四、依國家計劃，使私有財產趨於平衡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

「五、國家爲造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原則平和方法，移轉吸收私人生產或其餘值，以爲民族經濟擴充之資本」。

他們認爲「世界各國之立國，有一總原則：曰，民族主義，或曰，國族主義。卽同血統，同語言，同風俗，同歷史之民族，成爲一個單位。其對內也，各份子立於平等之地位，且具有一體之自覺；其對外也，應停止內爭，統一陣線，以臨外敵。然一國內之份子，因其財產地位之異，而生高下貧富之別，以致形成階級之對立，間接卽以破壞民族之一體性。欲矯正此弊，惟有採用社會主義」。

但是「凡信仰社會主義者，同時無不採用國際主義」。他們「則以爲國家之基礎，卽爲同血統，同語言，同風俗，同歷史之民族；社會之改造，亦惟有在民族單位以內行之，不應以此改造之責，期望於本國以外之其他民族。換詞言之，在本國基礎上，求社會主義之實現，此乃吾人之

社會主義，所以異於歐洲社會黨人所信仰之國際社會主義。民族一體自覺之實現，在一方面，不應有富埒王侯之豪族；他方面，不應有窮無立錐之貧民。凡為一國之國民，除因其特別之知識技能而享有特別地位外，其謀生，其教育，務使其達於平等地位，則國中自無階級鬥爭之可言。此種民族主義，乃建立於社會公道之基礎上。故吾人之國家社會主義，在一方面言之，以民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在他方面言之，以社會公道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謂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可，謂為社會的民族主義，亦無不可。

他們主張之政治原則有三：

「一、以民主政治為根本原則，依國情充量實現之。

二、國家政事注重效率；貴乎敏活切實；社會文化欲其發展，當任其自由歧異；以此為集中與開放之分界。

三、政治制度中，使專家佔有地位，以減少黨派操縱與捭闔之作用。

上項原則，所以實現於國家制度中者，更有下列各條件：

（一）國家之特徵，在乎統一的政府，應以舉國一致之精神組織之。（軍閥割據局面，一日

不打破，則統一的民治政府決無成立之望，此點大應首先解決。）

(二) 國民代表會議，由全體公民每若干萬選出代表一名組織之。凡黨綱公開，行動公開，不受他國指揮之政黨，一律參與選舉。

(三) 中央行政院（即內閣）由國民代表會議選舉行政員若干名組織之。各黨領袖，一律被選，俾成爲舉國一致之政府。

(四) 第一次國民代表會議，議決五年以內行政大綱，此大綱與憲法有同等效力，非行政院所能變更。

(五) 國民代表會議之主要職權，在乎監督預算，議定法律，不得行使法國之所謂不信任投票制，以更迭內閣。預算爲確立財政計劃，與其數字之方法，其通過與否，不生政府責任問題。

(六) 國民代表會議，關於行政大綱之執行，得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權。

(七) 行政院各部長，除因財政上舞弊情形或明顯違背法律外，不宜輕易令其去職。

(八) 行政大綱中，每遇一年或告一段落之際，由國民代表會議或其他公民團體聯合推舉人

員，檢查其實施事項與所宣佈者是否相符；若言行相去太遠，得經國民代表會議議決，令其去職。

(九) 文官超然於黨派之外，常任次長以下之官吏，不因部長之去職而更動。

(十) 國民代表會議之議員，宜規定其中之若干成，須具有農工商技術家科學家之資格。

他們認為「處此國難期中，應遇事表現舉國一致之精神；非然者，內無以團結，外無以應敵」。所以主張「今後政權公開之日」，政府組織「應舉行國民代表會議議員之選舉（第一次名曰國民代表會議，以後則曰中央會議。）由全體公民選出代表若干組織之。此代表會議中，各黨得一律參加，不容有所歧視。國民代表會議，既開之後，除議定根本大法外，更須議決五年以內行政大綱。此後政府行政，應以此項大綱為根據，不得絲毫出入，如此，在一方面可以樹立行政之共同目標；他方面可以表示舉國一致之精神。政府（即行政院）或名內閣，由國民代表會議選舉閣員若干人組織之，各黨領袖一律參加，自可免除彼此間之傾軋。此後閣員苟因意見歧異而去職，准許其所代表之政黨推出新閣員為繼任之人，以維持各黨間一致之精神。至於會議之職權，重在監督預算，議定法律，在此舉國一致之政府中，議會不應有時常更迭內閣之舉。其預算及法

律之通過與否，皆不生政府責任問題，俾政府得安於其位以行其政策。然政府並非毫無責任。所謂責任，視其行政之效能如何。凡行政大綱中，應執行事項，達於告一段落之際，應許人民代表審查其所執行事項與所宣佈者，是否相符。若其所行距其所言者尚不及百分之六十，應令其去職。致於政府之外，應以善良之文官制度補助之，更不待言。蓋文官制度若不力圖改良，令各黨黨員在其領袖庇護之下，從事於獵官運動，則國家政治，決難有上軌之一日。」他們認為「更有至要者，為個人自由之保障。」「主張三權分立之原則，吾國憲法中，仍當保留。」「申言之，司法之獨立與自由之保障有密切不可分離之關係」。

他們認為「現代之行政，日趨於科學化，專門化，當其設計之日，應由專家事先調查，及其執行之日，應尊重專家之意見，不容政客上下其手。……故主張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中，需多容納技術專家與科學家」。

他們規定國家社會主義下之工業政策和農業政策之背後，有總原則六條：

「(一) 為個人謀生存之安全，并改進其智能與境況計，確認私有財產。

(二) 為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濟私人經濟，確定公有財產。

(三) 不論公有與私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統一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擔任而貫徹之。

(四) 依國家計劃使私有財產漸趨於平衡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

(五) 國家為造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原則平和方法移轉吸收私人生產或其餘值，以為民族擴充之資本。

(六) 謀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上取得平等地位並得輔助之，並促進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

「(甲) 關於工業方面的主要問題有二：

(一) 私有財產存廢問題。

(二) 大工業之社會所有問題或曰大工業之國家統制問題。」

他們除了「主張私有財產，在社會主義實現之後，仍舊存在」以外，並規定「一國以內生產事業之經營，有下列種種方式：

(一) 就其經營主體言之，分以下五種：

1, 私人經營 (單獨公司)

2, 合作社。

3, 地方團體。

4, 私人企業立於國家監督之下。

5, 國家。

(二) 就財產享受言之，有下列三種：

1, 各個人之私產。

2, 法人團體之公產。

3, 國家之公產。

(三) 就利益之分配言之，有下列三種：

1, 工人兼為股東，分享股利。

2, 私人在大企業中所得之利益，受國家之限制。

3, 國營事業利益，為全社會所共有。

.....

「(乙)關於農業方面的主要問題，即土地之國有抑屬於私有？蘇俄自實行共產革命，首准農民各人自搶富農之地，據為已有。其法律上雖宣佈一切土地屬於國有，然事實上，俄國農民，仍可出賣其田地，不過其所出賣者，不名曰所有權，而名曰使用權。俄國農民之參加於集合農場者，各人所持有之土地，當其退出之際，仍另覓人出價接替，不過其所出賣者，亦名曰使用權，而不名曰所有權，此不過名詞之變更而已，並非實際所有權之取消也。故吾人之意，與其主張土地國有，反不如主張土地私有，而國家有全盤整理權，支配權，公用徵收權。國家既握有土地支配權，於分配土地時，應有以下兩種標準：

(一) 變佃農為自耕農。從反面來說，即廢除坐食之地主階級。

(二) 各人所佔之地，應以實際自己耕種者為限。

「至於邊省未開墾之地，可酌採俄國集合農場或國營農場之制。土地耕種，與農產經營原非一事，土地儘可歸私有，而經營之法，可參以合作之制。

「但中國農業問題，不僅分配問題；如改良種籽，改良副業，興水利等等，皆事關根本，不容忽視。此外更有緊急問題，即為農業金融。近年以來，全國金融，集中於大都市，稍有資產

者，皆托庇於租界，因而內地金融枯竭，農民無以自活。此則有待於國家治安之後，都市金融與豪富之家，方可以發生一種歸鄉運動。斯則為全國政治問題及治安問題，非銀行幾百萬資金散至鄉間所能有濟也。茲舉吾人關於農業之方針八條如後：

- (一) 國家對於全國土地有支配權，整理權及公用徵收權。
- (二) 農業區務使能與工業區聯合，俾農人得兼為工人。
- (三) 規定耕作單位。
- (四) 依法律與公道，使佃農變為自耕農，並以公道與平和方法化除工農。
- (五) 普遍設立農業貸款銀行，並補助與獎勵農業合作社之建立。
- (六) 大興與農業有關之水利。
- (七) 以科學方法改良種籽與耕作器具以及種植的方法並改良副業。
- (八) 提倡或獎勵畜牧與造林。

關於文化制度，他們認為「文化中之第一事，為思想問題。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為吾國文化最發達時代，可知思想自由，與學術發達，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欲求思想自由之實現，宜行下

列各事：（第一）大學教育，應超於黨派政治之外。（第二）大學教授，須享受嚴格之保障。（第三）爲言論出版之自由。要知政府誠能奉公守法，自不必以人民之批評爲懼。坐言之，人民誠有起行之機會，自然不致專發漫罵或不負責任之言論，此皆視政府平日所養成者如何，而非一味壓制之所能有效。」

關於教育者，他們認爲「現時教育之大病有二：一曰四萬萬人中大多數未受教育；二曰受教育者未必能受好教育。」所以「普及教育爲當今急務，並應限定年月，從速進行。即令不能實行正式之義務教育，應施行鄉村試驗區平民教育或千字課教育，二三年之內，使全國無一不識字之人民，則人人都有知識，可以有益於國家，而不至陷於賣國奸細之地位。」同時主張「大學地位，應超然於黨派政治之外，專負學術上研究責任。至於中學，不僅以會考爲改良惟一方針，應先將中學師資嚴加以甄別。中學師資之地位提高，中學學生之程度，亦因之而提高矣。就全國教育之普通目的而言，應有三個標準：第一，生產能力普遍化。全國中學小學及專門學校，應與其所在地之產業，發生聯絡，所有學生，於講堂功課以外，同時從事於生產練習，畢業之後，自然養成一種生產技能。第二，軍事訓練普遍化。全國學生在物質方面，要養成能耐勞苦的習慣，造

成強健身體。在精神方面，須培成勇敢犧牲服從奉公守法的道德，有事之秋，一呼而集，可以執干戈爲國家抵禦外侮。第三，團體生活普遍化。數千年來之吾國，對外既無交通，對內專以明哲保身爲能事。今環我而立之英美德法日諸國，其國民平日在政治上與聞國家大事，或開會，或議事，或入政府，皆能有共同合作之精神。此爲近代國家最重要之基礎，尤爲吾國人民首當養成者。吾國人之共同生活，曰無三人以上之團體，各闡意見或養成小組，是促國家之滅亡也。今後共同生活之習慣，或曰公平競爭之精神，或曰對外患時舉國一致之精神，皆吾國公民教育中所當先培植者也。」

總結一句，他們「所主張之教育，是爲有計劃之教育。凡政治人才，工商人才與夫教育人才，皆視各方面所需要而後從事養成。所以養成人才者，務須貫徹國家立國之大計，是乃爲國家而教育，非徒爲一人一黨計，而置民族立國之大目的於不問也。」

他們最近認爲他們的主張，「與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之三大主義措詞容有不同，而精神則並無二致。」又「衡諸抗戰建國綱領二十六條，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合法之充分保障云云」，認爲「政府態度與在野黨派所要求

不謀而合」，所以「開心見誠」，由他們的領袖張君勱教授具函，「以國家社會黨之主張行動」，向國民黨蔣總裁及汪副總裁「公開而說明之」。「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追隨」蔣總裁及汪副總裁之後，「鞏固主權，保全國土，使中華民族長保昔日之光榮，且得今後之自由發展」！

他們領袖間的見解和行動，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尤其在工作上的作風上表現着不小的差異。例如張君勱先生是不大喜歡作羣衆運動，而專從事上層聯絡。在這一方面，據說也收到一點相當的效果，曾經由陳伯南將軍資助，二十三年在粵創辦學海書院，以張東蓀教授爲院長，作爲訓練幹部的機關。諸青來羅隆基兩先生就有點不同，他們相當重視民衆活動，所以諸青來先生參加過「民治學社」，「救國會」，「憲政運動協進會」；羅隆基先生在「一二九」以後做了北方民衆救亡運動的領袖！

他們組織的構成份子是多方面的，有北方一部份教授如張君勱、羅隆基、梁實秋、張東蓀等，有北洋政府時代的軍人如湯薌銘等，有前外交部長羅文幹，和上海名流黃炎培，陸鼎揆等，也有康有爲氏遺留下來的戊戌維新派。在這裏要聲明的，這些過去主張保皇的先生們，參加到國

家社會黨的時候，是已經放棄了復辟的企圖。

他們的領導機關是採用委員制。由執行委員中推出總務委員八人，即張君勱，張東蓀，陸鼎揆，羅文幹，羅隆基，諸青來，湯薌銘，盧韓昌等。並以張君勱為黨秘書，為該黨最高領袖；諸青來為組織部主任委員；張東蓀為宣傳部主任委員；陸鼎揆為文書部主任委員。執行委員有梁實秋，梁秋水，徐公勉，黃炎培等人。他們的幾個主要領袖，如張君勱，黃炎培，張東蓀，羅文幹，陸鼎揆，羅隆基等，均已担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他們的組織，除陝甘等省外，各省均有省黨部組織。其中以江蘇、浙江、安徽、廣東、廣西、四川等省粗具規模。全國黨員約有一萬多人，其中幹部均係張君勱教授的學生，分佈在教育界，所以有人說他們的黨代表大會就等於學生們在課堂裏聽講，他們的活動不能出教室門外。不過，他們也以此引為自豪，因為由這證明了他們組織裏和網羅的都是一般智識份子。

聽說最近他們的領導機關快要改選了。大概是決定目前的行動綱領，調整領導機關，以及如何參加政府機構。

中國青年黨

中國青年黨是信仰國家主義的一個政黨。他們在中國雖不見有廣大羣衆的政治影響，然而他的派別的形成，却遠在民國十五六年大革命以前。他們是發源於二十年前在法國留學的一個青年團體。以後，我們就知道中國有一個國家主義派。因為他們出版有「醒獅」雜誌，把中國譬如睡獅，當睡着的時候，遭受各種小獸的欺凌，等待一旦猛醒，驚走了欺凌它的那些野獸。所以大家又稱它爲醒獅派。他們的組黨是在民國十二年的時候，他們爲適應當時環境，求實際行動的便利起見，對外尙守秘密，一切主張，都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名義發表，直到民國十八年九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認爲時機已經成熟，始發表黨名公開宣言，正式以青年黨的名義與國人相見。他們雜致的份子，大抵多限於知識者。他們活動的人物是左舜生，李璜，陳啟天，余家菊，曾琦，黃欣周……等人。他們信奉的國家主義，是有自己民族的優越感而排斥其他民族，否認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資本家的權力——的階級性，而認爲國家是超越階級而存在的，是社會

發展的最高階段，是人類中最高的理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認為民族運動的時期已成爲過去，現在則到了產生最高有機體的國族時代。同時以爲無產階級是可以壓服和利用的。

他們是怎樣去了解民族和國家呢？據黃欣周先生在他的從民族到國家裏這樣告訴我們：

「通常一般人不但將民族與國家二詞混用，並且對於民族和種族二詞亦不加區別。其實種族一詞，乃是人類學上的概念，人類學系動物學的一科，普通動物學家考察動物體貌之共見的不同表徵，以辨別某種動物屬於何科何種，人類學家則考察人類體貌的表徵——如頭形、身高、耳鼻唇的形狀，以及皮膚眼睛毛髮的顏色等等可以衡量的表徵——以辨別其屬那一種族。這完全是生物學上血統遺傳的事，與文化語言等無關。至於民族形成的因素，一般說法，不外下列幾個：（一）血統。所謂血統並不是說一個民族是由純一的種族血統構成的，事實上今日既無純一的種族，亦無一單純的種族構成的民族。任何民族都是許多不同種族的混合體；一個種族的血統也總是分佈到許多民族裏面去。不過種族的相當純一，確是有助於民族的團結的。（二）語言文字。語言文字是溝通思想及感情的工具，共同的語言文字足以造成共同的意思和共同的理想，因而鞏固了民族的精神基礎，這是不錯的。不過同一民族使用幾種語言文字也是常見的，但無論如何語言文

字總是形成一個民族的重要因素。(三)宗教。一個民族雖然有信仰不同宗教的，但是共同的宗教信仰，總是鼓舞民族團結精神的特殊力量，歷史上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民族分裂或阻礙民族結合的亦不乏其例。(四)風習。風習是鑄成民族性的重要部分，在風習形成之後，便不容易變遷，每個社會分子都不知不覺受其熏陶，為其同化，造成一個民族的特殊的生活方式。

「以上所舉的四者是一般的說法，其實除此以外，尚有地理的因素，即在地理上接連的或受同樣地理環境陶冶的人羣比較容易形成一種民族文化；歷史的因素，即在歷史上有了共同之創痛的或光榮的回憶，亦大有助於民族意識的發展；外力的因素，即形成民族的內部條件雖已具備，但民族的自覺意識尚在曖昧之間，這時如遇異族的外來壓迫，便足以促進民族意識的覺醒，加強民族的內部團結。

「從上面所講的形成民族的諸因素看來，可知它們也並非每個都是形成民族的絕對不可缺少之要素，也沒有一個因素是可以離開其他因素而自足的。一切民族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要為他們找出一些普遍適用的必要條件是不可能的。不過由許多或一部分並非絕對必要的因素之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民族集團性（包括共同意識，共同感情，共同願望，民族性等）却是一個民族所不可

缺少的要素。普通以為民族是文化的產物，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須知文化只是人羣社會在演化過程中為本身的需要而自然產生的現象，而民族集團性則是各種因素的綜合表現。人羣的機構發展到了表現民族集團性的階段，才可稱為民族。」

「我們如果將社會當作整個的有機的來看，則從民族到國家，就決不單是政治組織的進步，而是全體社會組織的演進。原來民族集團雖然在精神上具有一點共同的意識和願望，但要實現其願望，則非提高其組織的階段不可。因為在民族社會中，不但沒有普及全民的政治組織，其他如經濟、教育、軍事等組織，也只有了一些點線的形態。以如此鬆懈結構的社會，當然不能產生共同的行動，以實現其共同的願望。所幸社會總是因着內外的有機刺激而向着組織化全體化的路上走的，走得快的便成了現代的國家，所以國家可以說是進化後的民族，……所以國家只是比民族更組織化更有機化的全體（包括確定的領土在內）。民族進化到了國家的階段，其自身便已融在具體的國家組織中，再不是獨立的實在了。」所以他們認為「愛國本是無條件的，不當計及愛國對於自己有利無利益。」這一觀點是與國家社會黨相同的。

他們認為在這個抗戰的過程當中，必須迅速建立新國族政策。黃欣周先生向我們解釋說：「

關於我們的新國族政策，我認爲有三個必須遵守的原則：

「一、國族質素的改良。這就是普通所謂優生政策。……至於實行方面，總不外用免稅的辦法去獎勵優秀分子的生產，及設法提高其經濟地位幾種。對於戰區流亡出來的女同胞如果他們做了母親，我主張國家應按月給予薪金，作爲履行種族母親的神聖職務的報酬。」

「二、國族成員的增加。……我認爲獎勵人口的政策，是現代國族生存鬥爭的重要手段之一，因爲人力是國力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動力，其他的物力資力都是由人力產生出來的。……因此我主張除極少數低能兒及有重大遺傳病的劣者以外，對於水平綫上的人民，仍應獎勵其生育。」

「三、促進國內各民族血統的大混合，以擴大變異的範圍。……我認爲我們應該乘這個民族第三次大遷徙的機會（流亡者以優秀分子居多），實行國內各民族血統的大混合，爲國族培植新的原動力。」

他們對於抗戰的認識，據謝承平先生告訴我們：「我們全民對日血戰，不是消極的抗敵，而是積極的征倭。因爲這次中日血戰爆發決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歷史演變中一個必然的鬥爭；這並不單是中日兩民族的生存鬥爭，而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鬥爭。歐戰以後，日本這個

蠻性強烈的民族，在西洋列強決鬥之中漁翁得利，自以為世界永無和平，強權即是公理，於是他們的理想在以武力征服世界，而發其所謂野蠻的大和魂。至於中國呢，我們這個文化悠久的民族，在西洋互相殘殺和東隣趁機威脅之中，認為戰爭是萬惡，世界和平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於是我們的理想在以和平精神團結世界，而發揚燦爛的中華文化。因此，日本要征服世界，必先要征服中國，於是倭寇的鐵蹄空前地踏入我們的境內了。同時，中國要維護世界和平，必先抵抗野蠻民族的橫暴，於是黃帝子孫竟先任何強國而單獨討日作戰了。這真是歷史的壯舉，這真是偉大的犧牲！這真是對得住我們的祖先，對得住我們的子孫，對得住世界人人的神聖戰爭！

「如果我們對日作戰，單是為了保全領土，維護生命財產，縱然最後勝利是我們的，也不過讓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國民在這個世界上佔據了偌大的地盤，消耗了無量的衣食而已，於世界文化和人類幸福何有哉？並且，如果只為了全民族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那「救民不救國」的漢奸理論也很可以敷衍下去了。

「究竟我們為什麼要對日作戰？我們為的是要征服這個野蠻的倭寇，穩定東亞的和平，保障世界的共存，發揚中華的文化使命。除開世界其他各國所受的中華文化的影響不說，單是直接

中華文化下養育長成的子孫至少有六萬萬人口，我們中國和東方被壓迫的兄弟之邦同在倭寇威脅之中；我們勝利了，半個世界的人類先得到了自由。解放東方被壓迫的民族是我們中華民族所負的文化使命，在血戰征倭中必不能忘的最大的使命。

「認清了征倭戰爭中的中華使命，我們就明白這番神聖戰爭的艱巨；它的失敗，固不可以數量言；它的勝利，也不能以形體計。因而，更容易明白，這次血戰是必然的歷史壯劇，用不着批評它的應否爆發，更用不着咀咒它的目前失敗。至於借題發揮，以對外而對內的黨見更無計較的餘地。所可痛惜的，從半年的血戰中得來的教訓，我們的國族組織不够最高級的有機體，不够應付這次的國族生存鬥爭。所可欣喜的，傳統的家族主義，新興的個人主義，以及諸侯割據的部落思想都隨大時代的狂流而崩潰了。尤其是武裝軍民的捨身衛國，血染河山，足以重鑄中華魂，再造大中國，這是中華國族的新生，這是光榮勝利的基礎。中華國族的鬥士，他們的鮮血已經洗去了貪生怕死的劣根性，他們的精神已經征服了妥協苟安的奸徒。今而後只有拚命展開血戰的大道，爭取最後勝利的凱歌。」

至於抗戰中他們主張的建國問題的幾個政治原則，據黃欣周先生這樣告訴我們：

「現在大家都一致承認我們當前的革命任務，就是要打倒倭寇，將中華民國造成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就是普及全民的有組織的國家，所以今後在政治上應該走向民主憲政的路綫，是無庸置疑的。我們深信中國人的傳統政治精神病，只有經過民主政治的洗禮才能祛除。對於這一點，我們希望國民黨能够早日促其實現。年來「民主」彷彿是其他黨派常喊的口號，其實國民黨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佔過最光榮的一頁，民主可以說是「君家舊物」。完成中國的民主憲政運動，無疑地是國民黨的歷史使命之一。」

「其次，既然是民主國家，人民當然可以自由組織政黨，自由發表政見，自由活動，並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取得合法的地位。（憲法如何產生是另一問題，這裏不談）不過這裏要注意的，就是各黨既須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取得合法的地位，則必以各黨承認「中華民國」為前提，這是邏輯上當然的推論。」

「複次，現代國家是統一的，換句話說，在一國的領域內只能有一個主權存在，決不能容許兩個以上的主權同時並存，因為主權就是有機體國家自身的最高意志，主權是由國家組織中產生出來的，要是同一領域內容許兩個主權並存，就無異破壞了國家的統一，有了兩個國家組織，或

者形成了封建割據的局面，根本不成其為現代國家。所以近代國家的黨派雖多，只要共同站在一個主權的仲裁之下，並無害於國家之統一。根據這種觀點，我們認為至少目前全國的軍隊，應該一律改編為國防軍，絕對屬於國家而不屬於任何私的集團。同時政治上的區域也決不能自外於整個的行政系統。這是建設現代國家最起碼的條件。」

他們認為「今後的經濟建設運動」，應當注意到：

「一、關於國防重工業及其有密切關係的工業，必須完全由國家集資創辦，由國家自己經營。這樣，工業的重心既操在國家手裏，近代西洋的私人資本主義的流弊，就不難完全矯正過來。近來有些右傾的左派認為中國今日的革命任務乃在抵抗外來侵略，發達資本主義，這未免是一時心理的反動。現在國內任何黨派莫不一致主張集團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則國家統制經濟政策之必然代替了個人資本主義是無疑的。

「二、輕工業雖不妨由私人自由創設，但其經營必須依照整個的計劃，而且要受國家的監督，因為企業管理權的集中，在戰時是有絕對必要的。

「三、法幣政策自限制提存，統制匯兌，及購買外匯請核規則等規定以後，基礎已相當鞏

固，從此對外貿易已完全在國家統制之下，但國內奸商的乘機抬高物價，壟斷市場，依然層見疊出，因此調整物價的制度有從速實施的必要。

「四、抗戰以來，政府財源的三大來源——關、鹽、統稅既已大部斷絕，第一次五萬萬的救國公債又隔了好久才募齊，而且一般貪污分子藉此向出力的農民大肆勒索；真正應該出錢的人反而逍遙世外，這是不公平了。今後在籌措戰費方面，除增發紙幣，集中民間金銀，募集外債等等外，對於賦稅方面，應該增加所得稅率，同時創辦財產稅遺產稅和戰時盈利稅等新稅制，以減輕出力者的負擔。至於募集內債，最好實行向官僚資本家地主和富商股戶攤派，以符「有錢者出錢」之旨。

「除上列四者外，尚有附帶的一點，就是在今後的經濟建設過程中，我們應懲前毖後，充分信任專家的指導，嚴禁官僚政客的過問，庶乎建設的前途不致蹈廿餘年來的覆轍。同時民衆和輿論的監督，亦非常重要，不容漠視。只有在民主政治抬頭以後，理想的建設才有完成的可能。」

關於教育方針問題，陳啓天先生新擬了一個國家教育方針：

「（一）總方針二：

A 發揚民族精神

- 1, 對外培養民族鬥爭精神，以求能犧牲個人，以爲國家民族。
- 2, 對內培養國民協作精神，以求融合全國國民爲整個集團。

B 建設現代國家

- 1, 對外求國家之獨立
 - 2, 對內求國家之統一
- } 國家建設一切現代化。

(二) 分目標五：

A 國防教育

- 1, 灌輸國防中心思想。
- 2, 普遍實施軍事教育。
- 3, 發揮各種課程及學術之國防功用。

B 節義教育

- 1, 培養國民對於國家民族之節義精神——殉國。

2, 培養國民對於公家職守之節義精神——殉職

C 法治教育

- 1, 法律神聖不可侵犯。
- 2, 法律之前一律平等。
- 3, 循名責實信賞必罰。

D 生產教育

- 1, 教育生產化。
- 2, 生產工業化。
- 3, 工業國防化。

E 科學教育

- 1, 普及科學常識。
- 2, 提高科學之學術研究。
- 3, 獎勵依據科學方法，以研究中國固有之一切資料。

4, 獎勵應用科學於中國一切新建設。

至於「說到國際」，在他們「國家主義者的眼中，早已是恩仇了了。」他們說：「我們深知道凡一國家外交的出發點，都是根據其自身的如意算盤，絕對沒有什麼道誼情感可說，所以從來不願戴上有色眼鏡，今日作這樣一種的估量，明日又作那樣一種的期待；因為本來不存奢望，所以也無失望可言。」

他們「深信一個國家要能生存並且發展，必須這個民族對外具有奮鬥精神，同時對內具有協作精神。」更須在內政方面「懲治貪污與改進政治。」除上層民意機關設立外，必須設立「下層民意機關。」因為他們認為「民國二十多年來的政治，是愈往下層愈黑暗。中央政治比各省較光明些，省政比縣政為光明些，縣政的黑暗還不如區政，鄉政更為黑暗。許多下層行政的官吏如同縣長、區長、徵收局長、徵收員、聯保主任等等，其壓迫人民的程度迥出人意料之外。人民的財產可以隨意敲詐，身體可以隨意吊打，幾乎沒有一點保障。照這種情形，還想要人民愛國，如何可能？」

「要想糾正這種弊政，單靠上級機關的監督是不夠的，必須促成下級民意機關的設立，使公

正士紳，良善百姓，都有保障自己福利的機會。

「或慮下級民意機關易為豪紳所把持利用，不知豪紳之中公正者原屬不少，不能謂『有士皆豪，無紳不劣』。況且如果立法的時候能夠顧及各層民族的利益，使各層人民能依職業選舉的原則，取得自身的代表權，再由關心民衆利益的各黨派及智識份子加以監督，則未必不能選出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

他們認為「國家事業，好比是一種大工程。建設國家事業的工程師，就是政治家」。『政治家所需的充分修養，』依他們看來，「宜注意以下數點：（一）大願力。佛家首重發願，儒家首重立志，政治家也首重願力。政治家成就的大小，與他的願力大小成正比例。要為大政治家，便須有大願力。國勢艱危，重任在身。有益於國家的事，誓願做；無益於國家的事，誓願不做。檢點自己，省察過去。凡屬優點，誓願保；凡屬缺點，誓願除。（二）大悲力。國家遭難，民族受苦，同屬人民，休戚與共。要做政治家的人，必須多用一種悲天憫人的心腸去救國救民，不可專用爭權奪利的態度去害國害民。有了這種大悲力，然後才肯犧牲。佛家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是宗教家大悲力的表現。真正的政治家，也要修養一點宗教家大悲力的精神。（三）

大智力。政治家是要治事的，要治事必先知事。事有大處、遠處、要處，又有小處、近處、閑處。政治家必先知事的大處、遠處、要處，以便集中精力，多用功夫。何者為事的大處、遠處、要處，這便非修養一點大智力，無從知之。政治家是要用人的，用人必先知人。人有形形色色，事有大大小小。知人善任，量材器使，人盡其才，事盡其用，這也非修養一點大智力，無從知之。（四）大勇力。抗戰是何等艱巨的工作，建國又是何等艱鉅的事業。抗戰非短期所能了，建國更非短期所能成。現在我國既要抗戰，又要建國，自非有大勇力者莫能辦。負擔大任，趨赴前程，中遇波折，不稍游移，更非有大勇力者莫能辦。慷慨捐軀，固須有大勇力；從容就義，尤須有大勇力。大勇力並非完全天生的，可用修養功夫漸次增大，要做今後的政治家，自然須要多多修養一點大勇力。（五）大忍力。在我國今日複雜艱難的局勢之下，要成功一個政治家，必須修養大忍力。大忍力可分為兩方面說：一方面要有容忍力，凡能使中國得救者，則宜任其從容展佈，不必過於妬忌，這是必須修養的一種容忍力；凡以國家為前提，以法律為範圍者，則宜予以相當尊重，不必過於小器，這是必須修養的又一容忍力。又一方面要有忍耐力，即是說：責任在身，要能耐勞耐怨；責任不在身，要能耐冷耐閒。合容忍力與忍耐力，始成為大忍力。政治家的

風度，以有無大忍力爲定。政治家的成就，也以有無大忍力而定。從前我國紛爭不已，多由缺乏忍力，始而相毀，繼而自毀，誰也不能有所成就。今後欲使中國得救，須自政治家培養大忍力始。（六）大信力。政治家要以主張措諸實際，才能建立大信。漢申公說：「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如何耳。」商鞅變法，徙木立信。韓非說：「小信成，則大信立。」孔子說：「民無信不立。」何況要做政治家！所以要做政治家，必須立信，必須立大信。有大信，而後有大力。要大信力，必須少說空話，多做實事；少講權力，多開誠心；少徇私情，多佈公道。至於用人行政建立大信力的要訣，則在以身作則，樹立風範，循名責實，信賞必罰而已。」

他們「今後的言論態度，將不出以下各點的範圍：

- 「（一）吾人決心維護團結統一，凡違反團結統一的言論與行動，吾人將竭全力予以矯正。
- （二）吾人決心擁護政府，但政府的措置如有失當，吾人亦不惜以正誼加以督責。
- （三）抗戰九月，尙無一足以代表人民說話的機關，我們認爲是不對的，吾人將竭力促成「正式的民意機關之實現。

（四）吾人將指出青年在抗戰中應走的正當途徑；但吾人有決心，斷不做單獨有利一黨一派

的任何宣傳與煽動。

(五)對敵人的一切陰謀，吾人將根據可靠的資料，審慎的考量，隨時予以揭穿。

(六)對一切出賣祖國的漢奸國賊，我們將以嚴肅的精神大事聲討，決不姑息；不過因挾嫌誣陷或別有用心，隨意以漢奸頭銜加在別人頭上的一班小人，我們也深惡痛絕，認為有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危險，必加以相當的制止。

(七)對於國際的變幻，吾人將以國家主義者的常態，根據客觀事實，分別友敵，說明真象，決不先挾成見。

「總之，吾人以打倒敵人為第一，認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凡屬一黨一派的利益我們都看得很輕，包括我們自己在內。凡違反國家利益的任何言論與行動，不發現則已，如果發現，我們將不惜以全力與之周旋到底。」

他們取名為國家主義青年黨，大約有十五年的歷史。他們基本的口號和主張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還有一個：「撲滅共匪」的口號，是在救亡運動開展以後，才自動放棄的。他們的活動，僅限於上層社會，尤其注重各地的地方軍人，很少注意到下層民衆方面。

他們的政論機關雜誌，是「國論」，「中國青年」，現在又出版有「國光」，「新中國日報」；他們現在的活動人物是左舜生、曾琦、李璜、陳啟天、余家菊、黃欣周、謝任平、左幹臣等。其中左舜生、李璜、曾琦、余家菊、陳啟天等先生均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曾由左舜生代表該黨具函蔣總裁和汪副總裁，表現他們「深信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對於「國民黨最近所發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深信果能斟酌緩急先後，逐一見諸實行，必於國家有益」。

在這封信內，他們認為「中山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其一在爭取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憲政為指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立，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他們「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適相符合，願表示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為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他們「必本愛國赤誠，始終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如果認為他們「夙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他們「十五年來所慘淡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

」。他們「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始終不渝，補偏救弊，未嘗因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績如何，固不欲自爲陳述」。

總之，他們「觀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外此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外此亦無所企圖」。

一般人把王造時也認爲是他們的活動份子，殊不知王造時不過私人同他們很接近，在政治上的見解有某幾點同他們相類似，並未參加到青年黨的組織；而且王造時自己還有一個政治派別的小組織，不過他們不願向社會公佈那個集團的名稱。只知道他們的基本口號是：「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同時極力主張參加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熱心民主運動。所以王造時在救國會裏面極露頭角，成爲七君子之一。他們的中心人物是：王造時、彭文應、潘大逵、許鷗飛、汪馥炎。這些人都是上海各大學的教授。

全國救國聯合會

這不是一個什麼政黨組織，也不想形成一個派別的活動。他們再三聲明：「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而不過是要盡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職」，「只是要促成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一致抗日。因此，不能不介紹一下他們的真實情形，以供那些誤會他們是人民陣綫的朋友，作一個參考。因為這種誤會的存在，多多少少是足以障礙目前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的鞏固與擴大的。

救國會的產生，是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的企圖併吞華北五省，冀東傀儡政權和親日的冀察政委會成立的時候；特別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華北學生大示威，刺激了這些熱心救國的志士，於是才先後在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然後召集各地的救亡團體的代表與熱心救亡的個人，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成立全國救國聯合會，通過初步政治綱領和發表宣言。

在大會中，他們「很公開的批評各黨各派過去的錯誤，同時也很坦白的批評救國陣綫的過去錯誤。批評的目的，在糾正錯誤，使牠不會在將來重演，而決不是在攻擊任何勢力以致推翻任何勢力」。他們以赤誠告訴全國：「除了漢奸勢力以外，決不忍見國內任何的勢力，再在相互衝突中遭受一絲一毫的損失，要把他們好好的維護起來，統一起來，鞏固起來，作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巨力。」

他們當時認為「在現代國家意義之下，中央政府不應該只圖謀政權統一的權利，而忽略政權統一的義務——主要的是國防的任務；地方政府也不應該只在平時坐享土地的報酬與人民的汗血，而不負臨時保護領土與人民生命財產的義務。在敵寇侵入的時候，地方政府應該認定抵抗侵略與正式宣戰不同，應該認定敵來即拼是天經地義的守土之責，而決不能以聽命中央為苟且偷安的粉飾。中央政府在那時，更應該通籌全局，不分畛域，動員全國應敵，而決不能諉為地方事件，視若秦越。在過去，孤軍一隅之戰太多了！中央政府顯然已經忽略了國防的任務。尤其，地方的抗敵戰士英勇犧牲之後，中央親日派官僚接着就提出「親善」「妥洽」的主張，以打消他們的功績；那不但使人民痛心疾首，而且使死難的將士飲恨九泉！」「因此，」他們「要堅決的提

出：華北當局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應該一面抱與土地人民共存亡的決心，一面督促中央全力對外；中央當局更應該立下決心，與民更始。」。

因此，他們對於當時華北事件的主張：

「一、以發動一個「舉國之戰」的決心去應付華北事件；

二、立刻發動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根本消滅走私，同時表示抗戰決心。」

X X X X X

他們當時認為：「目下國內各黨各派，事實上誰都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很輕易的消滅誰。一、二八事變以後，中央當局會有六個月消滅共黨的代表；結果呢？歷時四年有餘，雙方犧牲了數十萬可以抗日的戰士和無數量的槍彈，到現在依然是存在着一個相持的僵局，而整個民族却已經陷於無以抗敵的苦境！這種事實證明：國內各實力派的鬥爭，徒便於敵人的侵略；任何實力派想用全力去消滅其他的實力派，即使能成功，結果也要因為自身實力的消耗而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俘虜。」

他們當時認為：「以往各實力派，至少在行動上多少犯了若干錯誤，這種錯誤，只有在推誠

合作一致抗敵的行動當中，能加以自然的糾正。」他們當時「認為政治領導權之誰屬，在平時要看誰能適應人民的要求；在目下要看誰能切實領導抗日戰爭。放棄了當前的大敵，對敵人作無限止的讓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敵黨敵派，用權威排除異己，用權術鞏固政權，那結果反只有使人心離散，而自陷於覆亡！」

他們當時認為：「在經濟力量和武裝力量上面，中央都占着高度的優勢，同時在政治上，中央負最重大的責任，自然也應該接受人民最嚴厲的批評和最迫切的希望。」他們當時「認為中央已往的錯誤，是在政治上放棄了民族革命的任務，而只在武力上企圖征服全國。中央目前的錯誤，是對外放棄了民族共同的大敵，而只對內在消滅異己上面把國防力量作孤注一擲」。他們「為整個民族打算，不忍再見任何力量在內部衝突中消耗，尤其不願意中央在錯誤政策之下，消耗了牠高度優勢的實力。只要中央能夠糾正過去的錯誤，能夠重新負起民族革命的任務，尤其能夠趕緊切實領導起來一個抗日戰爭，牠在軍事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是不必顧慮的；也只有這樣，才可能很自然的取得領導地位。」

他們認為在當時「全國團結一致的實現，已經有了更大的光明」。因為李宗仁氏當時「已經

表示焦土抗日的決心！馮玉祥氏當時「主張停止內戰，親善蘇聯，合力抗日；」共產黨也已經修改了一部份的政治主張，表示願和各黨各派誠意合作抗日。同時，他們「認為在理論上，中國需要一個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革命，原為各方一致的主張。已往所爭執的，只有應該採取手段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現在又剛好的在抗日第一的原則之下，很自然的得着解決了。」

他們當時認為：「過去互相間曾經發生政治爭奪的各黨各派，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是必然的。但是就因為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的緣故，內爭便要依然繼續，而一致對外便依然不可能。這種僵局的在在，要使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民感覺到憂慮與苦悶，要使民族永遠陷在自相殘殺的深坑裏面，以至於消滅！」他們當時「認為這種危險僵局的打破，是人民救國陣線當前最迫切的主要任務；也只有人民救國陣線的力量，才能打破這種僵局，才能促成各黨各派一致抗敵的聯合戰綫，以樹立民族的生機。」因此，他們「很鄭重的向各黨各派建議：

「一、各黨各派立刻停止軍事衝突；

「二、各黨各派立刻釋放政治犯；

「三、各黨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國陣線願為介紹，進行談判，以便製定共同抗敵綱

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

四、人民救國陣綫願以全部力量保證各黨各派對於共同抗敵的綱領的忠實履行；

五、人民救國陣綫願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黨派違背共同抗敵綱領，以及種種一切足以削弱抗敵力量的行動。」

X

X

X

X

他們當時認為：「救國陣綫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的任務，有歷史上的重要性。為要完成這種重大的任務，救國陣綫本身力量的擴大和鞏固，是極端必需的。」

他們鄭重的聲明：「救國陣綫以後對各地救國運動的開展，願意和當地當局作誠意的磋商；」他們對於在適當限度內允許他們進行救國運動的當局，「願意捐棄前嫌，推誠合作；」他們很誠意的保證他們的羣衆，「能够遵守磋商安定的範圍。」

X

X

X

X

他們當時認為：「中華民族向日本帝國主義抗戰，足以振奮全世界的人心，刷新全世界的耳目，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不但是人類和平的重大威脅，而且是人類道德的惡魔。全世界一切為

和平、人道、公理、正義而奮鬥的大眾，自然會認定中國的抗日戰爭，不但在求自身的生存，而更重要的在掃除人類的公敵。這是一個國際合作驅除人類惡魔的戰爭，而不過是由中華民族擔任了前鋒的任務。全世界良心未死的大眾，不但應該給我們以熱烈的同情，而且要很英勇的參加到這個國際戰線上來，共同抗敵。」

他們再開誠布公的通告全世界各國：「一切善意援助中國抗日的國家，人民救國陣綫願竭誠加以歡迎，而且願意永遠認爲友邦。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自然要成爲一個獨立的新國家；新國家對於各國的在華權益，除含有侵略意味之部分，應完全撤銷外，其餘的一律加以尊重。新國家將來在建設上面，需要各國的協助，是非常之多的；各國在中國獨立之後，在和平基礎上所能開展的投資和貿易，只有比現在增加，而且只有比現在更有保障」。他們「籲請各國：不要再相信日本帝國主義的花言巧語，希望在這不顧信義，不講公理的國際惡魔的保護下，保持或有發展在中國的權益。」

他們當時認爲：「這種光明磊落公平忠實的態度，能使救國陣綫成爲現階段最偉大的一種人民力量，而必然可以完成目下全國人民一致渴望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歷史功業。這種正確態度

的建立，不但可以博取大眾的共信，而且可以堅定內部的互助，一切外來的謠言，蜚語，都可以自然消釋；一切自覺的惶惑，苦悶，都可以豁然開朗」。他們「很熱烈的希望全體同志，都能在精神上得着一種新的鼓勵，在行動上得着一種新的生機」，「勇往直前的完成」他們「促成團結的主要任務，替救國陣綫開展一個新的時代，替中華民族建立一個新的基礎。救國陣綫有最純潔的動機，救國工作是最光榮的努力；全國同志在這個新的指示之下，應該用最坦白，最懇摯的態度，毫不猶疑，毫不顧慮的向任何人提出，理直氣壯，大聲疾呼在大眾前面爭取最大的勝利。」

這些斷言，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已經發動了的今天，看來並沒有多大的錯誤。雖然他們曾經說過「人民救國陣綫」這樣的字眼，這只表示他們的組織，純粹是人民救國的結合，不是表示與政府對立，而且是迫切的希望得到政府的諒解與領導；雖然他們很嚴厲的批評過政府，但這只是「希望之深批評之切」。雖說他們對政府會有誤解的地方，但蘆溝橋抗戰之後，政府表示了抗敵的決心，他們不獨聲明在中央政府領導底下從事救亡工作，而且連他們獨立的組織都取消，來表示他們的誠懇。這是證明他們的無成見，而只僅僅要求的是抗敵救國！因為中國的今日歷史條件和具體事實，却只能產生各黨各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絕不會產生反對內部敵人的「人

民陣綫」。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顯然地與「人民陣綫」有分別：「人民陣綫」主要地是勞動者的陣綫，它首先反對的是國家內部的敵人；而民族統一戰綫不僅比「人民陣綫」的社會成份要廣泛得多，而且它的對象是在反對外部的侵略者及其走狗。所以我們更可找出他們過去沒有反抗政府的根據，即是參加救國會並沒有什麼限制，只要他是主張抗敵救國，只要他主張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不管他是屬於什麼黨派，什麼階層。所以救國會的份子，除了大部份是無黨無派的份子以外，其中國民黨、共產黨、國社黨、民族革命同盟、第三黨、都應有盡有。

因為他們是這樣的結合，所以各黨各派的政治意見也常常在救國會內部反映。有人雖然盡了很大的努力，想把救國會內關於抗日的意見溶合為一致，使他們的行動能夠集中；可是除了抗日的一個大目標相同以外，關於抗日的的方法却很難趨於一致。即是說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參加的成份有幾種不同的觀察，尤其是那些企圖挑撥內戰的份子如XXX等，在救國會內盡了挑撥和煽惑的能事，他們主張抗日和反X是聯繫的。他們極力攻擊那些承認蔣委員長有抗日可能的人，是向國民黨投降，是共產黨的右傾機會主義。結果因共產黨在救國會內極力的支持，和大多數會員表示意見，主張全民族統一戰綫的意見獲得了勝利。因這一理論鬥爭的展開，所以在七君

子被捕之後，都沒有引起羣衆對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有破壞的行動。自七君子恢復自由後，所有救國會領導下的羣衆，都積極參加或發起抗敵後援會和其他救亡團體，從事各種救亡工作。救國會的領袖和幹部，有的則參加到政府擔任了職務；有的則參加到軍隊，從事殺敵的工作；並同多方面的物合流，成立了一個全國抗敵救亡總會，要求：「立刻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組織、訓練，並武裝廣大的民衆，增加現有軍隊，擴大游擊戰爭，展開真正的全民抗戰！」「擁護國民政府與蔣委員長，加強全國的團結，鞏固全民族的統一戰綫！」自國民參政會設立，七君子中的沈鈞儒、鄒韜奮、王造時、史良諸先生被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都遴選爲參政員了。我想諸君子定能本諸初衷，在政府所付於參政員的職權以內，完全代表民意，以副救國會的羣衆和大多數國民的願望！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民族革命同盟，是發源於王禮錫等的A·B·團（反布爾塞維克）。以後加上陳銘樞將軍等十九路軍的人物為骨幹，而組織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當福建政變組織人民政府的時候，一度會同第三黨左派國家主義派組織生產人民黨。生產黨解體後，遂組織民族革命同盟。

他們最高領導人物是四大巨頭：即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等將軍。下設七科：組織、宣傳、軍事、民運、總務、海外、不管。由陳××、梅××、葉××、宣××、彭××……等分任。

他們自己聲明不是政黨，只是些主張抗日的份子的結合。他們過去是主張反×抗日，在西安事變時是不贊成和平解決。這種見解不久也改變過來了。自蘆溝橋抗戰爆發，他們認為抗日的要求已經達到，於是李濟琛、陳銘樞以下的份子都紛紛北上，接受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一致參加抗戰；並宣言將民族革命同盟的名義取消，以表示他們的誠意。現在將他們公佈解散的宣言錄後：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成立，其目的端在促進全民族力量之集中，對日抗戰，以達到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自蘆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統一，在此偉大民族戰爭逐步展開之時，吾人應本公誠之態度，共求民族統一之鞏固，促進全民抗戰之成功，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明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海內外同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效力抗戰，以貫徹吾人之素志。所望全體盟員，此後各自淬厲，本歷年抗戰之決心，作民族忠貞之戰士；並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髮之秋，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謹此宣言。」

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以後，恢復了李濟、陳銘樞等人國民黨的黨籍，使他們仍然站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到國民黨內去工作，這正實踐了蔣委員長的話：

「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爲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

由於他們的結合是一種同盟的形式，所以在解散以後，大部份過去參加該組織的份子多已『各自尋找各自的政治前程，』已不能算是一個『政治派別』。但是原來十九路軍的骨幹，因為他們結合的歷史性，在局外人看來，無論如何，不能不算是一個『政治派別』。這些人的意見，可舉最近恢復國民黨黨籍的陳銘樞將軍的言論：『鞏固統一，抗戰到底』以作代表。茲錄其原文於后——

「反日武力侵略的民族戰爭的發動，已快到半年了。這半年抗戰過程之痛苦經驗所給予吾人的深刻認識：是我們要一直抗戰到底，始能爭取民族生存；是我們要努力鞏固統一，始能抗戰到底。」

「在幾個月的抗戰當中，我們誠然失去了廣大的土地，連北平天津上海乃至首都南京等文化政治經濟中心，都相繼淪陷於敵人手中了；然而我們決不應以此自餒，我們原是一個國權橫遭帝國主義蹂躪的國家，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且是一向被敵人估計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可以全部征服的國家，以我們這樣國力，應付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強敵所發動的強烈侵略戰爭，居然要使敵人在預想以外的長期間內，付下預想以外的莫大代價，始能博得當前的些許勝利，這，我們不但不應該自餒，且反而要因此愈益振奮。」

「不過，戰爭是一大實驗，同時也是一大批判。根據過去數月的戰爭經驗，使我們深深感到：對日戰爭誠然把國內多年的分裂現象統一了，但那種統一如能進一步的團結，進一步的鞏固，則在內政外交諸種國策上，當可表現較為合理，較有統制的步調，從而，表現出更堅實的抗戰力量。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在這危亡緊迫關頭，我們全國朝野上下人士，應急自警惕，在抗戰到底的大目標下，鞏固統一；而專誠擁護領袖，排除個人小我利害打算與意氣爭執，則為鞏固統一的基本條件。以目前情勢而論，對於抗戰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擁戴，已為舉國朝野人士一致的傾向和堅守不渝的信念。但在朝野人士間，在舊來諸黨派關係間，仍無可諱言的殘留下了一些不必要而且有乖抗戰大目的的疑忌與磨擦；多一分疑忌與磨擦，則減一分抗戰力量。我希望全國智能有為之士，不要在這一方面浪費了個人的精力，貽誤了民族前途，我個人始終在以此自勵自勉，始終在企圖化除朝野間各黨派間的隔閡，而造成全國一致挽救危亡復興民族的共信。

「團結精神與鞏固統一，並不是抽象的寄之於空言，而是要在當前抗戰的許多重要緊迫的問題與國策上，從大處遠處着眼來達到合理的有效的解決，例如：

「第一，就政治機構問題說：爲了抗戰的需要，對於既成的政治體制，當然要設法求其充實

與調整。然而這種充實調整的施行，都應以便利抗戰活動的推進為原則，不顧戰時急需的門戶成見，利用戰時機會的攘竊企圖，同樣有礙政治機構的調整。若把這種個人小己利害關係的打算消滅了，那政治機構究應如何調整，在如何的限度民主化，並採取如何的步驟來「改革」等等問題，就不難隨戰爭的實際需要，而得一合理的解決了。

「第二，就外交問題說：目前許多人對於外交上的問題，都抱着一些悲觀的疑慮：我們是否真在英美法蘇間「尋求與國」？某某國家怕不會出兵扶助我們？對日不撤回大使的用意何在？所有這些疑慮，誠然有一部分是由於實際事實的反映，但那種事實的形成，却又是因為統一不夠鞏固，意志不夠融合，以致在外交步驟上難免不顯出一些不夠明確的表現，與模糊的觀念。但時至今日，全國上下已經確定誰是我們真正友人或「與國」了，我敢相信，我們的與國不久將有機會表示其更大的友誼。至若對日絕交與撤回駐日大使問題，早已因北平傀儡政府的成立，而成為亟待急需解決的問題了。

「第三，就民衆運動問題說：抗戰幾個月中所感到最大的缺陷，就是我們沒有利用我們在人口上對於敵人的優越，我們沒有把民衆力量與軍事力量配合起來。像我們這樣一個產業落後的國

家——一個產業雖落後，但却有廣土衆民的國家——與強敵從事戰爭，當然要盡量迴避敵人的優點，而發揮自己的長處。我們不能藉落後的經濟組織來動員廣大民衆，勢不能不藉政治的社會的軍事的力量，把民衆組織起來。然而，幾個月來，組織民衆的呼聲儘管普遍，其需求儘管隨抗戰的加緊而日益增大，而實際的民衆運動，仍只局部的在若干戰區見諸實行，這原因，仍舊是由於團結的意志不够融合，統一不够鞏固，以致在民衆運動的發動上，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顧忌和不應有的妨礙。當前的緊急情形，已不允許我們猜疑瞻顧了。我們在朝在野的人士，應立即下大決心，破除地盤主義，破除不切實際的形式主義，破除高調的口號，在全國民衆動員的總綱領之下，製成真正全民抗戰的局面，以挽回當前的頹勢。

此外，如安定後方的傷兵問題，難民問題等等，誠與前述三大問題持有息息相通的關聯，但這類問題，目前雖亦非常緊迫，大體是技術性質大於其原則性質，我們如對政治機構問題，外交問題，民衆運動問題，都能破除成見，破除私的利害計較，以公忠體國的精神，以相忍爲國的精神，從大處遠處予以考量，而求得國策的明決確定與一致支持，那就是從實際的狀勢中鞏固統一，同時也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最大公無私的態度來推進民族戰爭。

「總之，當前抗戰到底的先決條件，是儘可能的多方的設法鞏固統一。」

大家知道，「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義，過去幾年曾經被很多人用過。其中比較著名的，當然要算現在論及的這個組織的前身，以及在崇明島學習游泳溺死了的孫偉章先生所領導的一個小組。這些曾經用過「社會民主黨」的名義的組織，不是自動地更換了名義，就是該組織不久烟消雲散了。雖然一直到現在一般人還稱「民族革命同盟」的那些先生們是「社會民主黨」，可是却被一位先生痛斥過。這位代言人自承與「過去主持民族革命同盟的諸先生」「有多年友誼」，但是不承認參加該組織的，可是却在巴黎救國時報上曾經很賣氣力的替「民族革命同盟」作過代言人，大意是說：「中國沒有社會民主黨存在的社會條件，社會民主黨是反革命的，中國沒有社會民主黨，有的只是民族革命同盟。」由這一「代言」看來，中國是沒有「社會民主黨」了。但是前不久在漢口舉行的反侵略大會上，却又有散發署名「社會民主黨」的宣言。據知道此中情形的人講，這個「社會民主黨」是在「一二·九」學生運動興起以後，由北平幾個名教授某某等人組織的。如果這個傳言是屬實的話，我希望這個組織負責的諸先生，能够把他們的政治面貌公開出來，因為現在的政治環境已經不是從前的「黨禁」時代了。

附錄：托洛斯基派

大家所知道的托洛斯基派，也即是以前稱爲的托陳取消派。他們自稱是「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塞維克列甯派反對派），是世界法西斯的走卒托洛斯基所領導的所謂「第四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

在世界範圍來講，托洛斯基派已由一個政治派別，墮落到做了反動法西斯的走卒；當托洛斯基派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已經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奸細，肆力破壞民族統一戰綫的時候，當然更不能算一個政治派別。可是有些人還把它看作是某一黨某一派的私敵，不把它認爲是全民族的罪人。所以我們不能對它取旁觀態度，應當對它的言論和行動，加以清算。對托派任何姑息寬容，都是抗日戰綫上的損失。

托洛斯基派之流入中國，還是在莫斯科受了托洛斯基洗禮的徒子徒孫帶回國來的。那時爲了鼓吹托洛斯基主張，還印行了「我們的話」、「十月」、「火花」等刊物。恰巧中國共產黨過去

一個領袖陳獨秀，因為在大革命時代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以致把中國革命弄得失敗，事後又固執已見不接受批評，開始小組織活動，被共產黨開除了黨籍，他同彭述之等人組織了一個「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後來這些團體合流，組織了一個托洛斯基主義研究委員會，並成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彭述之、劉仁靜、馬玉夫、（陳獨秀被捕，是他告密的。）……等都是它們的中央負責人。他們吸收的份子，多半是被共產黨開除了的人物，其活動最多也不過及於少數大學生和教授。他們認為中國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中國共產黨聯合了國民黨的結果。認為共產黨在國民黨還未清黨的時候，就應該進行土地革命，樹立蘇維埃政權。共產黨不如此做，所以失敗了。同時他們認為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政權是穩定了，資本主義有發展的可能。中國的工人階級應當對資產階級讓步，只要求政府召集國民會議。他們的主張處處都與中國共產黨對立。可是當中國共產黨看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整個民族生存的時候，轉變了路線，號召各黨各派合作共同抗日，爭取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托派又認為中央政府不會抗日，共產主義者不能爭取民族資產者革命的勝利，只能爭取工農社會主義者的勝利。目前縱然要主張民族革命，不是為的擁護資產階級，而是為的實現社會主義。所以

托派主張反日和反中央政府是聯系的，是應該建基於世界革命之上的。

在中國托洛斯基派的機關刊物「鬥爭」發表有托派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塞維克列甯派政治決議案」。這決議案中，托派主張同時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中農。他們認為能夠革命的只有工人和貧農，其餘的社會階層都已經成了革命的對象。他們並且集中目標打擊中國共產黨，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乃是中國革命運動中最大的障礙」，認為共產黨是叛變了民族，因為共產黨主張集中火力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儘力維持英美法等國在中華民族的抗日鬥爭中的中立態度，甚至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主張同他們作某種攜手，以獲得國際上援助。托派却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企圖孤立中國的抗日運動。

其次，托派認為中國「真能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只有工農兵士以及下層小資產階級等勞苦大眾」。中國的地主，不論大小，在他們看來當然是不會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甚至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其政治的與經濟的地位使然，也根本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尤其不能反抗最急進的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托派認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要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任務「視同仁地看待，而且「要抗日鬥爭得到勝利，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國民黨以及軍閥的政權。」

在托派政治決議案中，土地革命也是當作社會主義革命提出來的。所以他們提出了「土地歸貧農」的口號！這就是說，鄉村中的貧農不僅要反對地主和富農，而且連中農都在打倒之列。

總而言之：托派主張工人貧農應該聯合起來，在對外方面，同日英美法等一切帝國主義作戰；在對內方面，同時推翻地主資本家富農中農。這氣魄是浩大的，他要工人和貧農像趙子龍在長板坡一樣匹馬單槍地同一切人作戰。然而其結果，恐怕不僅是斷送了民族的前途，而且斷送了工人階級自身的前途。

在民族統一戰綫大致上業已結成，實行抗日戰爭的今天，一部分托派份子又改變了過去的政策，表面上主張中立調和，實際上却極力挑撥國共兩黨的感情；以最公開的態度，取得政府方面之合法手續，從事於「反三民主義」和反「斯達林黨」的各種社會活動之開展。

讓我們來檢討他們在抗戰以後的全部理論吧！他們認為「抗戰勝利的唯一道路」，是：

「一、軍事動員的根本任務：

「（1）着重城市的保護和爭奪」。他們認為「城市是中國的心臟和「穴道」，是中國的寶庫和堡壘，一切作戰行動必須以城市為最重要的爭奪對象，以保衛城市（尤其是一切重要城市

），奪回城市為主要任務……因此誰只要佔有城市，誰就能夠利用城市的新式技術和各種經濟政治，文化的集中力量，佔着優勢來對付鄉村方面的各種問題（包含反抗運動）」。換句話說：即是在各城市尤其是重要城市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濟南、太原、蕪湖、被敵人佔領以後，我們就不能抗戰了！這完全是響應敵人「速戰速決」的漢奸理論，根源於這種理論，所以譏笑擁護蔣委員長長的中國抗戰決勝的中心在於全國鄉村的人，為「顛倒混亂的「農村派」思想，結果只會引導中國走上最後失敗的盲路」。殊不知中國原是一個半殖民地下的半封建性的國家，「中國境內的工商業資本主義」，「在國境以內對於廣大散漫的農村小經營和封建「殘餘」而言」，「却無疑的」不能完全「站在支配者的地位」，事實上也已證明在幾個重要城市尤其是金融中心的上海失守以後，鄉村中的生活固然有了變化，但絕不是如托派估計的那樣會全盤崩潰。因為這樣，所以可能使我們在必要支點的城市固守以後，退在被敵人佔領地區的側後方，發動廣大農民的游擊戰，不使敵人以一城一市之得，發展成爲線與面的佔領。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點，把我們一二期的戰略決定「必須以爭奪城市為一個作戰的中心策略」，那才真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完成它「速戰速決」的「如意算盤」！

「(2)從速組織那有最大救國力量的民衆」。關於這一點，他們告訴我們：「城市和爭奪城市的重要，就顯出中國各種人民救國作用和顯出勞工是有最大的救國力量。假如這一點不明瞭，在現代(半殖民地)的中國，實在可以不必談什麼「組織全國鄉村人民」，「動員全國民衆」！」他們認爲勞工才「是城市的天然的守衛」者，「有產業有錢的人」一到危難的時候他們便可「身輕如燕」的捲着財物逃難(國難！)或者便是對日本人出錢買安份，像平津上海許多人那樣，乃至做漢奸。」「受過高等中等教育的智識份子」或「自由職業者」，「因爲他們常常幫助有錢者(中國或外國的)努力辦事而得到一點好處，所以他們受着後者的影響，常常帶着動搖不定的心情。軍隊和農民游擊隊雖然可以調到城市區域去保衛「中心堡壘」，但他們終究不是從事工業生產，不是在城市「生根」的人……都不及勞工那樣順便適當」。所以他們主張救國的政策，應當採用「從前俄國李甯」曾經用過的「事半功倍的政策」(即「經過勞工來領導農民」)。

這種理論是很「高超」的，真是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們「真是「高超」到天上」去了。可是正因爲他們「高超到天上」，就看不到「地下的中國」現在是處於什麼時代！那些「生活在天上」的托派先生們喲，請你們下地來看看「地下的中國」，她現在還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有一個

最兇橫的敵人正要把她從半殖民地的地位拉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不管那個階級都感受到奴隸的運命立刻就會降到自己的頭上。這些階級的份子爲了要做自己的主人，正聯合一致，在同侵略的敵人作血腥的戰鬥！爲了支持這一神聖的戰鬥，需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能因爲參加的個別份子「動搖不定」或怕「危難」，就把他們趕出去，而讓「勞工」去單獨作戰！托派的先生們！告訴你們吧：「地下」的勞工不願聽你們那套「高超」的理論，願意腳踏實地的幹，因爲他們知道現階段階級的利益已經與民族的利益一致，外部的矛盾已經超過內部的矛盾！你們要勞工去單獨作戰，是處心想害他們，不是在愛他們！你們應當記得你們剛才提起的那位「俄國李甯」先生的話：「任何革命，如果得不到農民的參加，都不能求得勝利」！托派的先生們，革命尙且如此，何況現在的救國！

「(3)「全國皆兵」制和正規軍的配置」。他們主張「擴大現在「抽調」壯丁的方法而爲全國皆兵制；……可以有十分之一人口的壯丁軍隊（約四千萬）和十分之一的戰事勤務隊，婦女救護隊和少年先鋒隊（約四千萬）。這四千萬軍隊其中十分之四，五應當是地方性的「坐山老虎」——民軍，十分之五，六應該作爲輕便調動的「正規」軍隊。」

「不過這種大規模的軍隊，目前似乎大半只能由人民自動組織義勇軍來做到。」

關於這一點，他們也知道「目前似乎」是做不到，只好「由人民自動（！）組織」的幹起來！如果人民不這樣「自動」幹，他們就斷定不能抗日；如果人民真的這樣「自動」幹，引起了內戰，破壞了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那他們就認為「目的已經達到」了。

「（4）游擊戰要城市化」。托派說：「關於游擊戰的問題，我們只有充分注意兩方面（就是城市要游擊化和游擊戰要城市化），才能融成一種有機地動作的戰爭藝術。……必須使一切已有的游擊隊伍，以保衛和奪回城市為一種最重要的工作」。這是他們一貫的只「爭奪城市」否定鄉村的錯誤觀點。我們大家知道現階段有效的戰術，是運用機動地運動戰，配合陣地戰，輔佐以游擊戰；而不是亂用術語，說什麼「城市要游擊化和游擊戰要城市化。」

「二、一切經濟力量要怎樣才能總動員？」

「（1）實行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他們主張「只有實行強制的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中國的財政才能充裕。中國除上海天津外全國金融業工商業等公司財產，據實業部的統計，約有六十萬萬元，上海中國股黨存在外國銀行的財產，據一般人的估計，約在六十萬萬到一百萬

萬元左右。徵收百分之二，三十的話，我們就可以有三十萬萬元的抗日經費。

「中國國民的收入，大約有二百萬萬元，假使徵收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所得稅，也就可以有三十萬萬元。」

「要怎樣才能使累進稅實現呢？就是要實行財政的民主化和生產的民主化。只有由國民大會——大多數人民的決定和監督，累進稅才能徹底執行成功，財政的收支也能切實分配和公佈，而革除各種痛心的浪費或舞弊。只有由生產中的人民成立監督業主或財主（如僱員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等），才能使虛報，逃匿，舞弊等情絕跡，且使營業不發生有意停閉及操縱等情。」

「怎樣才能使累進稅實現」的方法是提出來了，但是要「誰」去實現呢？請求政府用立法的方法去「實現」嗎！可是他們又認為「因為有錢的在社會上有較大勢力，他們對政府施壓力，不許政府要他們掏腰包，而同時，假使政府中又有許多有錢家庭出身的來負責，自然要向別的方面設法了。」「由國民大會——大多數人民的決定和監督，」「由生產中的人民成立監督業主或財主的組織」來實現嗎！可是「大多數人民」和「生產中的人民」現在看得清清楚楚，認為用「自動」的方式來實現，只有增加各階層的分裂。由托派自己來幹嗎？可憐得很，活動了十多年，還

只剩有幾個「光桿」領袖。因為這幾個「光桿」領袖又只會哼幾聲：「叩啣！叩啣，叩我的墓門！——或者「被別人牽着鼻子走路。」「做啦啦隊」歌頌一篇張伯倫是現實主義者，和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大罵一聲「蘇俄爲什麼不出兵？」究竟怎樣幹呢？他們最後的手段，只有鼓惑「勞工」「自動」。這樣一來，大則可以造成內戰，小則也可逼得那些「有產業有錢的人」真的「捲着財物逃難（國難！）或者便是對日本人出錢買安份，像平津上海許多人那樣，乃至做漢奸。」真的「動搖」那些「受過所謂高等中等教育的智識份子或「自由職業者」」。因爲這樣，方可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

「（2）收回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財產」。他們認爲「中國主要的經濟力量操在外人手裏。不收回這些權利，那等於說，我們沒有運用我們主要資本技術來抗日救國，那還說什麼「經濟總動員」，什麼「長期抵抗」呢？」這就是說：要先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再能够談抗日！「因此，不用說日本的特權財產應即刻收回，就是英美法意一切帝國主義財產，也不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之後才收回（這樣就打不倒日本了），而是爲了要打倒日本起見，在抗日的過程中，在日本被打倒之前，就一定要將牠們收回。」如果英美法意等國不肯，他們就勸我們「全國必須準備妥

當，來自動收回我們民族的財產。『他們也知道『那時候（收回權利的時候），各帝國主義或多或少的一致反對中國革命，是必然的』，會『要勞財動兵進攻中國』。如果這實現了，在他們那些『另有作用』的人當然是『於願已償』，可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真是要『墮入萬丈的深淵』！

『（3）耕者有其田，和八小時工作制』。關於這一點，只要徹底推行最近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公布的『抗戰建國綱領』，和完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可以做得到；不過是時間問題。托派不願意了解這一點，主張『應施強制方法，以平均地權』。他的理由是『應該着重在『團結更多的』農民去徹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應當『着重在『團結更多的』地主去進行僅僅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民族戰爭』』。這是喫了統計數字『這種只講『多』』的虧！他們不知道目前這些『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地主』，還有足以依賴的反抗力量！同時也沒有認清目前民族危機的迫切性！最可令人奇怪的，他們過去論為『土地革命』在中國是已經成爲過去了，中國現在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革命』；『在這個抗戰期中，他們又提出要地主的『土地應不取價的交出』，顯然是企圖破壞全民族的聯合戰線，真是『爲目的不擇手段』了！

『三、怎樣動員一切政治力量？

「(1) 民衆組織和自由」，「(2) 國民大會；普選，和立即召集」：這裏成爲問題的，只是怎樣召集的問題，他們是主張「立即召集」的，他們又認爲「因爲軍人官吏大多總是不願放棄特權，實現全民政治的，所以最可靠，「最鄭重的辦法」是由將來工農政府來召集全民普選的國民大會。」

「四、督促蘇聯政府和國際工會團體切實援助中國。」

他們「估計中日實力的對比」，「日本方面的力量，應該加上漢奸及「高等華人」的動搖妥協，加上德意等的聲援，加上英美等對牠的讓步或拉攏，加上蘇聯政府和第三國際的保守主義，加上在「反共」號召下一切資產者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早或遲的同情。中國方面的力量，應該加上日本，朝鮮的工農士兵的反戰反帝革命運動，加上蘇聯，加上世界各國一切勞工和士兵的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早或遲的同情，可能的時候再加上英美等「緩進的」帝國主義的某等技術合作」。所以他們罵那些主張「運用國際聯盟的機構和英美等國在遠東與日本的矛盾，使英美等國幫助我們的抗戰，或最少使他們中立」的人，爲「空想」，爲「空話」，是「迷糊了頭腦」，是「擁護帝國主義，放烟幕彈的總機關——國際聯盟，擁護帝國主義吞佔殖民地的「盟約」，

擁護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家」所領導的「人民陣綫政府」等等！」他們並且威嚇我們，說：「現代一切經濟政治問題，最後，最根本的解決是在乎國際力量。我們（註：托派自稱）假使認識不清什麼是我們的國際力量，和什麼是不利於我們的國際力量，並且確定不正確的國際政策，那末就使我們在國內的力量發揮到極大，像蘇聯那樣，還是會被帝國主義打敗的。」他們的錯誤在那兒呢？第一，不是事實。例如日本「反共」的號召並未能得到「一切資產者的同情」，因為那些人都看得很清楚，日本是在進行獨佔中國，很嚴厲地侵犯到那些人本身的利益；再如蘇聯並沒有失敗，而且正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了我們不小的援助；英美等國也給了我們相當的幫助。第二個錯誤，「最根本的解決是在乎國際力量」，這是根源於他們一貫的錯誤：「世界革命不成功，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不反對一切的帝國主義，根本不能對日本作戰」的謬見，是他們在哲學上所犯的錯誤「只注重統一看輕對立」的繼續，是他們不了解「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我們進行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固然要運用真正正確的國際政策，但是「最根本」的決定，還是着重在「使我們在國內的力量發揮到極大！」

他們主張「目前我們外交上應該做的事就是：

(1) 對日意等立即宣布絕交。

(2) 向蘇聯提議立即成立反帝國主義的攻守同盟（雙方用民主方法進行，如按人數比例召集代表大會，決定切實的反帝行動，推選合作動員的委員會）。此刻還應該督促牠馬上舉行大規模抗日募捐和示威等。

(3) 向一切國際勞工團體（第二，第三，第四國際等）立即進行反法西斯和反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的聯合戰線；並要求牠們馬上切實援助中國（如捐款，罷工反對運輸和製造日德意的軍用品等）。

(4) 要求平日主張「和平」，「民主」的西班牙、墨西哥、英、法、美等所謂「民主政府」，給中國一些切實援助。

(5) 宣布退出國聯（最多可改為旁聽），否認一切國內和國際上的不平等條約。

(6) 訓練每一個民衆，尤其是常和外國勞工及軍隊接觸的中國軍隊及碼頭，海員，郵電，機器工人等進行國際民衆的聯合戰線；例如第八路軍對「每個士兵都教會了四句日本話，使念得純熟，（一）不殺被壓迫的日本弟兄，（二）我們只打倒日本軍閥和資本

家，（三）中日弟兄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四）優待被俘的日本士兵」（見十二月三日掃蕩報），便是好榜樣。對蘇聯和國際團體懈怠的領袖，應該提出嚴格的批評並要求牠們的羣衆糾正這種現象。」

「五、健全聯合戰線這架抗戰推動機」。

「（1）在「全民聯合戰線」中表現你的忠誠和「卓見」，」（2）聯合戰線——行動一致意見貢獻自由」：他們所主張的「全民聯合戰線」，只是「一種抗戰中某一時期的「聯合戰線」，」所謂「全民聯合戰線」就是能「犧牲一切」的工農民衆和只能犧牲部份利益的人的「聯合戰線」。他們主張在抗戰的中途，這些「犧牲一切」的工農民衆和只能犧牲部份利益的人再「內戰」起來，成立「生產人民的聯合戰線。」因為他們相信「只有「生產人民的聯合戰線」才能完成抗日救國的艱難事業，才能痛快淋漓的使全國人民起來救國！」

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盡着日寇別動隊的作用。無怪乎連他們的領袖陳獨秀出獄以後，都認為「他們的頭腦已成爲化石，組織已成爲廢墟。」說：「對民族革命不參加，對民主運動不參與，天天坐在亭子間空談理論的左派先生們，現在絕對與他無關係。」（見托派份子羅漢給上海

某友人的信。他出獄以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衆應當擁護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斯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不過陳先生還未脫離「五四」時代的臭味，把今天爭取中國獨立自由的民族解放戰爭還當作「五四」時代的工業與科學論來咀嚼。殊不知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實現民族解放，則任何發展工業與科學的可能都沒有，而且現在僅有的工業都被日寇破壞無餘。這一點淺顯的小道理，就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在最近的經驗中體驗到了，甚至他們中間的一部份人還提出了比較進步的主張。但是，陳先生竟落在他們的後面了。同時陳先生雖在口頭上不同意托派的所行所爲，但還不能拿出大政治家的風度，正式否認與托派組織無關係，澈底的接受過去的錯誤。他不惟不如此做，而且盲目地一口咬定「五四」運動時代還沒有過去，「以及歌頌對侵略者讓步的張伯倫是「現實主義者」，和盲目地不承認國際上有所謂「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以致還不能擺脫反革命的嫌疑，我們很爲他「五四」時代的光榮歷史可惜。

在這兒，我們對托派的那些領袖們根本用不着起絲毫的幻想，希望他們「轉變」。因爲他們的行動是有國際指示的。他們的國際領袖托洛斯基就曾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給他們的一封信，要

示他們「不去阻礙日本侵略中國」。關於這一封信，大概他們是不會承認的，但他們自己翻印的一本托洛斯基「對於中日戰爭的意見」，是不會否認吧！在那本小冊子上，托洛斯基說：「所有中國工人組織底任務是自動地參加這一戰爭的前線以反抗日本」，「但是蔣介石呢？我們（托派）對於他，他底黨及所有中國上層階級，沒有存一絲一毫的幻想……明天許會有新的叛變，這是可能的，有真實性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托洛斯基在替中國托派計劃「怎樣反抗蔣介石」的時候，主張「到某階段——這我們（托派）不能預先決定的——這種政治的對立能夠而且必須轉變為武裝的鬥爭，因為內戰和一般戰爭一樣也是政治的繼續。但最要緊的，是須得知道當甚麼時候和怎樣把政治的對立轉變為武裝暴動。」「工人先鋒隊一面站在軍事戰爭的前線，一面便準備在政治上推翻資產階級。」「我們（托派）絕不因爲蔣介石進行戰爭而不攻擊他。不，我們攻擊他因爲他進行戰爭得不好，沒有用充分的精力，不信用民衆尤其是工人。」並且國際托派「對中日戰爭的決議案草案」這樣公開地說：「國民黨代表蔣介石，一貫就是日本在中國進行了無底止戰爭的幫手。」「民衆是絲毫不相信蔣介石能對日本作有效的抵抗。」因此，托洛斯基在中國黨的黨徒接受了這個指令，便決議了他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毫無遺漏地向民衆揭破國

民黨政府的整個政策。」「認爲「將來的國民黨政策祇是血污的叛變政策之繼續。」「目前誰如果因爲擁護抗戰便對國民黨政府起絲毫幻想……誰就是事實上的漢奸。」「（見托派「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

照他們這種言論和荒謬行動看來，有人證實他們接受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我認爲可以相信。

王獨清、由監獄出來的彭述之、劉仁靜（即劉鏡園），以及前在陝西陰謀殺害王以哲將軍會被臨汾羣衆捕獲的漢奸張慕陶，在上海同唐××一道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羅漢等，現在都是他們的領導人物。

他們現在出版的刊物有「鬥爭」，「火花」，通俗刊物有「大路」，「戰旗」，「抗流」和「勝利的路」。

另一副面目出現的托派，就是葉青（任卓宣）、柳甯（朱其華）、鄭學稼（家禾）、倪金生（王宜昌）、金海如（丁逢白）、艾生（譚輔之）、劉敏（王特夫）……以公開的態度，取得合法地位，出版了「抗戰與文化」和「抗戰嚮導」等刊物專門從事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正統的

托派以左的面貌，向共產黨說：「你不能參加民族統一戰綫，否則你是出賣工人，向敵人投降了，墮入了愛國主義者的泥坑。」葉青等就以右的面貌，向國民黨說：「現在的政權是你打出來的，如果共產黨要參加抗日，就應當要他取消共產黨的組織；否則抗戰失敗了，是日本人的天下；抗戰勝利了，是共產黨的天下，」就這樣左右挑撥，收殊途同歸之效。

葉青這位先生的歷史是很有趣的。他原名任卓宜，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他在法國時，就同周恩來，李立三，陳延年，陳喬年等組織過中國共產主義少年團。後來做過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廣州市委，湖南省委書記。他在湖南做共產黨省委書記的時候被捕了，判決槍斃，可是因槍決人數過多，以致未打中他的要害，被人事後救出即逃往上海。過了一些時，他又因事在湖南被捕，當軍法官問他：「這次是願再槍斃一次，或願自首？」的時候，他就把湖南共產黨的組織全部供出，尤其是萍鄉工人區域破壞得最厲害，犧牲了不少共黨幹部，連他的愛人都出賣了。事後辭去了這個偵稽員的職務，回到四川做成都大學的教授，還是天天大講其馬克思主義，以博取青年學生的歡心；等到學生認清了他真正的面貌以後，他又跑到北平，辦「廿世紀」雜誌，從事研究哲學，口頭聲明以後願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終身。這時就與托洛斯基派的觀點漸漸合

流起來。葉青的筆名有花生……等。至於柳甯則是朱其華的化名。他過去一面辦「社會新聞」罵共產黨；一面又化名朱新繁，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參加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在西安事變之後，他曾辦過雜誌：「中國研究」，專門罵共產黨不該同國民黨合作，最近又主張國民黨應當獨裁。這種用心，真可說是「路人皆見」！

托派內部的觀點是極不一致，幾乎彭述之有彭述之的見解，劉仁靜有劉仁靜的見解，陳獨秀有陳獨秀的見解，所以形成內部很多小派別。其中分裂得最利害的要算北方的一個以杜畏之為首的小派別。據杜向人表示，他們已經脫離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取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工人黨了。

震動世界之第一部

偉大經濟學名著

資本論

原著者 卡爾·馬克斯
 譯者 郭大力·王亞南
 出版者 讀書生活出版社

資本論的產生，正像一個新社會的產生一樣，它的一切經過，都是鬥爭的，革命的，它雖然受到一部人的嫉恨，但也受到更多人的歡迎和擁護。它不單是經濟學上的寶典，並且是唯物辨證法的最好的模範；理論上像鋼鐵那樣堅密，利刃那樣的銳；內容上，像海洋那樣淵深；文章上，就像它的真理那樣健全，美麗，動人！

資本論已經是我們熟知的一個名字，它的內容已經用不着我們再來介紹，本社爲了要把這部偉大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兩年前特請在古典經濟學上花了十多年功夫的郭大力王亞南兩先生，從德文原本（第四版）全部譯成中文，郭王兩先生費了兩年多的心血，堅苦的完成了本書的翻譯工作；而他們的譯筆又是那樣的嚴謹，忠實，流暢，可以說是近幾年來譯著界一個巨大的收穫了。

全書總目 函索即寄	第一卷	精裝	一冊	3.30元
	第一卷	精裝	二冊	2.60元
		平裝	二冊	2.60元
	第二卷	精裝	一冊	2.40元
		平裝	一冊	1.80元
	第三卷	精裝	一冊	4.30元
平裝		二冊	3.60元	

本社最近出版及總經售新書

陝行紀實	楚雲作	三角五分	邊區自衛軍	(詩歌)	柯仲平	一角六分
游擊戰教程	明凡著	四角五分	國旗飄揚	(三幕劇)	羅烽著	定價二角
在祖國的原野上	須旅編	三角五分	生路	(獨幕劇集)	章泯著	三角五分
抗戰中的軍事動員	任洵著	一角五分	血	(獨幕劇)	章泯著	二角五分
民族革命與農運	民族革命社編	一角八分	台兒莊	(集體創作三幕劇)	王瑩等	三角五分
唯物戀愛觀	默涵譯	七角五分	家破人亡	(獨幕劇集)	章泯著	定價二角
當前的幾個實際問題	柳乃夫著	定價三角	民族公敵	(獨幕劇集)	舒非著	四角五分
資本論的文學構造	鄭易里譯	三角五分	抗戰中政黨和派別	(增補本)		五角
			讀報常識	(增訂本)		二角五分